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

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

Away from Centrism: Jonathan Unger, Baogang He
and the Multiple Agendas of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曾彥中

Yen-Chung Tseng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October, 2009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

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

Away from Centrism: Jonathan Unger, Baogang He
and the Multiple Agendas of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曾彥中

Yen-Chung Tseng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October, 2009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
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

曾彥中
撰

98
10

目 錄

誌謝.....	v
中文摘要.....	vi
英文摘要.....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	3
第一項 問題意識.....	3
第二項 文獻檢閱.....	5
第三節 研究背景.....	7
第一項 澳大利亞文化認同轉型.....	7
第二項 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	12
第三項 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發展背景.....	13
第四節 研究對象簡介.....	15
第一項 安戈的背景簡介.....	15
第二項 何包鋼的背景簡介.....	16
第五節 研究架構.....	17
第一項 研究方法.....	17
第二項 章節安排.....	19
第二章 安戈的中國敘事.....	21
第一節 安戈的個人背景及研究經歷.....	21
第二節 安戈的思考架構及研究特色.....	25
第一項 研究方法特色.....	25
第二項 安戈的研究思考脈絡.....	26
第三節 安戈的農村研究.....	29
第四節 安戈的中國轉型研究.....	34
第五節個人、環境、反應—安戈與其中國敘事的綜合分析.....	39

第三章 何包鋼的中國敘事.....	45
第一節 何包鋼的個人背景及研究經歷.....	45
第二節 何包鋼的思考架構及研究特色.....	48
第一項 研究方法特色.....	48
第二項 何包鋼的研究思考脈絡.....	49
第三節 何包鋼的中國轉型研究.....	52
第四節 何包鋼的中國農村敘事.....	60
第五節 結構、境遇與行動—何包鋼與其中國敘事的綜合分析.....	66
第四章 影響澳洲中國研究多元化的整體分析.....	70
第一節 地方研究.....	71
第二節 後漢學.....	74
第三節 歷史研究.....	76
第四節 其它整體性因素及特色.....	79
第五章 比較與結論.....	85
第一節 何包鋼與安戈之比較.....	85
第二節 薄紗下的多元—澳洲的漢學研究.....	88
參考文獻.....	91



誌謝

經過一段昏天黑地的寫作生活，終於完成了這本論文。寫論文的的日子是苦悶的，幸好在這段期間內得到許多人的支持與幫助，我才能在緊迫的時間內順利完成本書。首先必須感謝石之瑜老師，他給了學生們很大的自主發揮空間，且不厭其煩幫我們逐句閱讀批改，這段期間多次煩擾老師，真的是既感謝又不好意思。此外，我從老師身上學到了很多對人生的思考和道理，老師對我們的關心和著想，讓這段時間的經驗顯得格外寶貴而親切。我很感謝在人生中能遇到這麼好的石老師，真的。

其次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姜蘭虹老師及柳金財老師的指導建議，幫助我改善寫作中的諸多不足，讓這本論文的水準得以提升。作為我研究對象的安戈教授及何包鋼教授，對於我的多次請教皆親切回應，讓我能釐清研究中的諸多問題，在這裡也對兩位老師致上深刻的感謝。另外也謝謝何包鋼老師的博士指導學生 Michael，和他的聊天通信，讓我對澳洲當地的思考方式有了更好的掌握。也感謝國鼎學長在澳洲的協助，讓我們的澳洲之行過程得以順利。

同儕的支持更是這段期間不可或缺的寫作動力。圭之學姊負責協助石門同學的各項事宜，著實辛苦。姿潔學姊在我請教寫作上的問題時常給予協助。貞伶及宗翰等參與澳洲研究團隊的同學，在研究及資料收集的過程中帶來很大的實質幫助，謝謝你們。也謝謝有形的陪伴鞭策以及提供笑點，支撐我在過程中持續寫作。另外有陪我度過大量愉快時光的 302 研究室同學如禾田大哥、佳旻、雪琳。還有菇姊和大神等令人景仰的大大、最熟悉的陌生人威霖、嘴砲小天使波波、人很好太極神拳阿亮、時常支援精神食糧的童學長、羽球俱樂部的成員以及其他石門研究團隊的同儕如綺齡、曉玲等等，都讓我在思考上能有所突破。很高興遇見你們，我不會忘記這段日子的回憶，祝福大家未來都有美好的發展。

我還要特別感謝室友品希以及他的父親陳格理伯伯，因為他們的幫助讓我在研究所期間能有安身立命之處，得以無後顧之憂的從事論文寫作，在此特別謝謝你們。最後，我要把這篇論文獻給我的家人，我親愛的爸媽以及弟弟，謝謝你們的陪伴與支持，我們是最幸福的一家人。

曾彥中 民國 98 年 10 月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並檢視澳洲漢學界是否確實多元寬容，讓來自各地的學者得以在此自在發展研究。本文分別從微觀層次及宏觀層次來對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作檢視。在微觀層次，以安戈及何包鋼兩位學者的學思歷程來考察外地學者在當地的研究情況；在宏觀層次，則就澳洲漢學界中具影響力的研究主張及其它整體性因素來對此多元性作分析。最後，本文認為澳洲漢學界確實展現出寬鬆多元的特性，並有利外地學者的加入。但此多元性仍壟罩在一層西方屬性的薄紗之下，允為薄紗下的多元。

關鍵字：澳洲中國研究、澳洲中國學、漢學、安戈、何包鋼、陳佩華、後漢學。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multiple agendas of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therefore the English name of this thesis is "Away from centrism", which also means pluralism.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issue through both microcosmic and macroscopic terms. In the microcosmic term, I take two sinologists, Jonathan Unger and Baogang He as the central figures of my research. Through studying their research, we can observe the situations of immigrant sinologists in Australia. In the macroscopic term, I look into the multiple agendas of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through introducing three influential methodology views in this field and other holistic factors of Australia. I conclude that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indeed highly present pluralism tendency, but still covered by a gauze of western color.



Key words: Australia's China studies, sinology in Australia, Sinology, Jonathan Unger, Baogang He, Anita Chan, new sinolog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澳大利亞對當代中國的研究興起於二次大戰之後，以後起之秀的姿態在中國研究領域急起直追，並取得了優秀的成果。由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頒發的李文森獎（Levenson Prize）¹，每年會頒發一次給該年度評選為最傑出的中國研究論文或出版物，是西方研究體系下中國研究領域內最受矚目的獎項。在過去這個獎項幾乎由美國學者所包辦（僅有一次為英國學者獲獎），然而在最近的 2004 到 2007 年間，已經連續四年由澳大利亞的學者獲獎²。澳洲最大報「The Australian」曾訪問 2007 年的獲獎人杜登教（Michael Dutton），其表示：「澳洲人在中國研究領域僅次於美國」。英國謝菲爾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東亞研究院院長韋立德（Tim Wright）在一篇研究報告中³指出：1997～2001 年間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CSAA）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數為 274 篇，超過歐洲中國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自 1998～2002 年間 454 篇論文數的一半以及英國漢學研究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1989～2002 年的 91 篇。澳洲的中國研究協會每兩年開一次會議，2009 年的會議地點是在雪梨，包括博士生以及學者有兩百多人參加，發表超過一百篇以上的研究論文。

相較於日本、英國及歐陸列國等在傳統上有漢學研究基礎的國家，澳大利亞在早期的中國研究相較之下顯得十分薄弱；而和同屬於這個領域新興的研究強國美國來看，澳大利亞不僅在所能使用的資源上遠遠不如，甚至在對中國的資訊及研究

¹ 全名為 Joseph Levenson Prize，該獎又分為兩個項目，分別為「西元 1900 年前的中國」及「西元 1900 年後的中國」兩個研究項目，每個項目評選出一份作品作為該年度最佳中國研究出版物，於亞洲研究學會的年會上公佈。

² 2007 年為 Michael Dutton。2006 年為 Antonia Finnane。2005 年為 John Makeham。2004 年為 Geremie Barme，另外 1998 年澳洲學者 John Fitzgerald 亦曾獲獎。

³ 參閱 Tim Wright 原著，劉霓摘譯，〈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中國學比較〉，《國外社會科學》，2004 年第 6 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上長期跟隨歐美。那麼，澳大利亞如何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其研究系統並取得優秀成果呢？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對外國學術人才的借重。澳大利亞的學術界常強調其學術研究的多元風氣及學術環境的開放性，聘請並吸收許多外國的學術人才，中國研究亦是如此。在澳洲的中國研究形成過程中，除了澳洲學者本身的努力外，來自歐美的學者以及華裔學者亦構成了兩股重要的力量，他們在行政領導、研究方法及人才培育等層面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澳洲的轉型經驗：澳洲在歷史文化上從「白澳」轉向開放多元政策，在心態上從確保自己為歐美國家的一員走向世界，並進一步出現一種成為世界模範公民的自我期待；這種對開放性與世界性的自我期待反映到澳洲的中國研究將呈現出哪些特色呢？以下針對不同背景的外國學者，討論他們如何影響澳洲的研究氛圍以及澳洲的漢學研究。

本文以兩位當代重要學者作為深入觀察的對象，分別為美國旅澳的學者安戈·喬納森（Jonathan Unger）以及中國旅澳的學者何包鋼（Baogang He）。美、中兩地是構成旅澳漢學家兩股主要的來源社群，而他們兩位學者在澳洲的中國研究領域占有重要的地位，有關中國研究的作品廣為學界知悉，並在國際上享有聲譽。安戈現為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er,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主持人，1987至2005年間曾主編中心所出版的知名國際期刊《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⁴。安戈受到社會學訓練，對中國社會的轉型頗有看法。何包鋼現則為澳洲狄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國際關係研究講座教授，曾任澳洲塔斯瑪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政府學院副院長，在中國民主化的研究上素有名聲，且活躍於國際社會，近年則積極在中國推動協商民主的相關實驗活動。這兩位同為旅澳的重要當代漢學家，都在中國的基層進行實證研究，他們對同一相關議題的論述態度及方式值得加以比較，說明不同知識背景如何形成更多元澳洲中國學界。安戈在表達對中國轉型的看法時，著重於詮釋理解這些轉型事物的意義，雖然對中國的開放有所期待，但常避免使用要求中國民主化等字句；相對於

⁴ 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於1979年所創，1995年前原名《為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誌》（*The Australia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是在學術界有重要地位的期刊。

安戈，何包鋼對中國的民主化則抱持著極大熱情，積極推動中國轉型。他們所呈現的這些可以對比的研究態度，是否與他們所來自不同的背景有關呢？而澳洲與他們各自之間又存在著什麼相互的意義？澳洲的學術環境又因他們的參與呈現出甚麼樣的樣貌？本文將透過比較分析兩位學者的研究，以及在澳洲漢學研究領域的整體性因素觀察，試圖分別從微觀角度及整體分析外國旅澳學者、澳洲學者、澳洲中國學特色等課題。

第二節 問題意識及文獻檢閱

第一項 問題意識

澳大利亞是一個晚近成立的年輕國家，澳人一般均認同他們與英國的特殊關係，至於從心態上脫離英國屬國展現出自主獨立意識，則是更晚的事了。到七零年代澳大利亞開始在國內提倡多元開放的文化風氣以前，確保自己身為「西方文明」的成員一直是澳大利亞極力推行的政策方向。近年澳大利亞知識界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定位，以鼓勵多元開放來取代西方中心的思維。然而澳大利亞並不需要放棄或壓抑自己過去的西方傳統，因此採用的是豐富自我構成元素的方式以讓自己「不只屬於西方」。若能抱持多元的族群、文化以及提倡開放寬容的態度，一個理想中的澳大利亞似乎應能呈現出「世界村」的樣貌。近年澳洲以政府為首的各界，除了鼓勵多元文化能自由在澳洲的土地發展萌芽外，也積極期待自己能以普世關懷影響國際。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學術研究風氣也懷抱多元性的理想，除了鼓勵外國學生留澳，為數甚多的外來學者受邀至澳大利亞進行，並佔有重要地位，在漢學研究的領域亦是如此。在此氛圍中，外來研究者的背景與「澳大利亞」間理當毋須感到衝突。有研究曾指出，在美國的華裔漢學家就非如此，他們常因雙重身份認同而呈現在美國與中國價值間的徘徊掙扎，這種掙扎來自於意識到所屬環境的主流

論述與他們所屬的中國背景有差異⁵。薩依德 (Edward W.Said)⁶將這樣的身份困境稱為「居於其間」(in-between)，是一種缺乏安適的身份歸屬狀態⁷。對薩依德而言，雖然自幼家庭便試圖將他教育成一個英國及美國人，但先天的身份與旁人的差異眼光，使他對所處的環境始終存在一種格格不入的疏離與不安感。相形之下，可以根據同樣的角度觀察來自美、中兩地旅居澳大利亞的學者，他們能不能各自在澳洲的主流知識與自身背景之間取得調和。假使當地的學術環境確實能寬鬆多元，不形成壓抑個別學者研究的主流範式，則或可稱此為遠離中心主義的環境。若有此理想環境則能讓個別學者保有更大的自主空間，讓外地赴澳的學者能更加自在的發展研究，並豐富澳洲中國研究的內涵。

本文選定的兩位當代外國旅居澳洲的重要漢學家，分屬於在澳洲中國研究裡兩股重要的移入群體，即歐美及華裔學者。本文雖不能逕行以他們二位代表歐美與中國兩個知識社群，但至少仍可作為探究來自歐美國與中國的知識輸入對澳洲產生影響的一種途徑，所以選擇的標準不在於能否代表母國社群，而在於他們之間的可比較性以及觀察他們所創造展現出的可能性。他們的研究議程與內涵中確實呈現出可比較性，透過比較觀察兩位學者的研究生涯與內涵，將有助於探究澳洲學術界的移民性或多元性如何與知識活動相互影響。

首先，本文將對兩位學者的研究議程中可相互比較的部分作進一步的探討，期能解析這些異同背後的意義，包括兩位學者都在從事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實證研究，但安戈重視的是調查與歸納的實證研究，而何包鋼則較強調規範與演繹的實證研究。他們對於中國農民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安戈抱持一種同情的態度來看待農民在近代的遭遇，而何包鋼則積極樂觀的期待農民所擁有的能動性和開創改變的可能性。在對中國轉型議題的態度上，何包鋼期盼中國能夠民主化，安戈則抱持著相對和緩寬鬆的態度。這些問題都將在之後做進一步的討論。

⁵ 參閱郭佳佳，2008，《離散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政治學趙穗生，鄭永年面對中國的身份策略》，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出版。

⁶ 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W.Said, 1935~2003)，當代著名文學及文化批判家，為美籍巴勒斯坦裔學者，生前任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代表著作為《東方主義》(Orientalism)。薩依德生前並致力於為巴勒斯坦在國際上發聲，堪稱巴勒斯坦的代言人，惜已於2003年因白血病而辭世。

⁷ 引自宋國誠，〈閱讀左派，四海之內皆過客－霍米·巴巴的「本土世界主義」(下)〉，破報網站。<http://pots.tw/node/2316> (02/03/09')

其次，兩位長期留居澳洲的學者在研究中是否呈現出某些澳洲特色呢？而他們的研究內涵若與知名當代澳洲本土學者，如費約翰（John J. Fitzgerald）或古德曼（David Goodman）的關切或方法比較，能解讀出什麼其他的意義？在對中國的觀察及切入角度上，他們身份上的世界性和澳洲本土的學者有何異同？本文希望能對構成澳洲中國研究重要力量的外國旅澳學者建立一種閱讀視野，以期對中國研究的知識性質做出更多元的反省。本文並不試圖整全性的定義澳洲中國研究性質，而關注於理解澳洲中國研究裡的多元特色。另外，雖然在澳洲的中國研究內容十分廣泛，但本文仍聚焦於發展歷史脈絡最完整的政治、歷史等人文科學研究領域。

第二項 文獻檢閱

在澳洲漢學研究此一議題上，過去的研究文獻並不多。在中文資料部分最重要的是胡再德的博士論文《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研究》⁸，該文整體性的介紹了澳洲漢學研究的發展歷史，並選擇各時期澳洲重要漢學家的研究來介紹。他將澳洲中國學的發展分為起步、確立、繁榮和繼續發展四個時期，認為其主軸為引進、借鑒及本土化，敘述澳洲漢學發展從初期仰賴國外學者到開始培養本地研究力量並取得成果的過程。劉霓在何培忠主編的《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⁹中負責寫作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介紹，對澳洲漢學研究機構及研究資源作出簡明的敘述。旅澳漢學家劉渭平在〈漢學研究在澳洲〉一文中¹⁰，講述澳洲因經濟利益而開始重視亞洲的背景，並以自身參與的經驗介紹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漢學研究發展。何漢威在〈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研究〉¹¹中，詳細介紹了澳洲國立大學的中國研究發展過程。由於澳洲國立大學與雪梨大學是澳洲漢學研究的兩個重鎮，因此以上兩篇文章都具參考價值。

⁸ 胡再德，2005，《澳大利亞中國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⁹ 參閱何培忠主編，2006，《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¹⁰ 劉渭平，1995，〈漢學研究在澳洲〉，見林徐典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歷史哲學卷》，北京：中華書店，頁244—250。

¹¹ 何漢威，1983，〈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3)：185-191。

在以英文為原文發表的資料部分，首先有澹烟翻譯澳洲學者胡珀（Beverly Hooper）的文章〈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¹²，簡報澳洲漢學研究的趨勢及研究人才培訓狀況，並呼籲澳洲漢學界應和中國學界持續展開更多的合作。另外還有劉覓翻譯韋立德的文章¹³〈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中國學比較〉，本文分析澳洲因地理位置及政治因素而較英國更為重視當代中國，中國研究領域也因此得到了較多的資源挹注。前澳洲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理事長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該會第 28 期的會刊中¹⁴，比較澳洲與美國的漢學研究，認為澳洲長期存在著以中國為中心出發研究的傳統，亦即在研究中重視中國自身的觀點。劉明新翻譯澳洲漢學家馬克林教授（Colin Mackerras）的文章〈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研究〉¹⁵，該文呼籲澳洲各界應更為重視與亞洲尤其中國的重要性，展開更密切的交流，還介紹了澳大利亞重要的漢學研究機構以及漢學家。

在旅外學者身份背景、環境以及他們著作表述之間關係的探討上，有兩篇著作討論。郭佳佳在《離散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政治學趙穗生，鄭永年面對中國的身份策略》中，比較趙穗生及鄭永年兩位華裔漢學家的中國民族主義研究，發現趙穗生所處的美國會使他不宜凸顯自己的華裔身份，用綜合各家學說的方式迂迴為中國辯護，而鄭永年所在的新加坡因對中國較為友善而沒有造成這種壓抑的影響。孟祥瑞則在〈到西方寫中國大歷史：黃仁宇的微觀經驗與美國的中國學社群〉中¹⁶，分析華裔的黃仁宇因不認同西方學術觀點看待中國的方法而在美國學術界遭受挫折，並常因自身背景被質疑其中國研究不夠中立客觀。以上兩本書，可與本文中討論安戈及何包鋼在澳洲的研究作比較參照。

相較於這些文獻，本文以下的分析在發掘澳洲漢學研究整體特色方面有相同

¹² Beverly Hooper 原著，澹烟譯，2001，〈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國外社會科學》，（5）：83 - 85。

¹³ Tim Wright 原著，劉覓譯，2004，〈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中國學比較〉，《國外社會科學》，（6）：64-68。

¹⁴ 參閱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澳洲中國研究協會）的會刊 CSAA NEWSLETTER，2003 年，第 28 期。

¹⁵ 馬克林原著，劉明新譯，1997，〈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研究〉，《世界民族》，（2）：78-81。

¹⁶ 孟祥瑞，2007，〈到西方寫中國大歷史：黃仁宇的微觀經驗與美國的中國學社群〉，《國家發展研究》，7（1）：69 - 92。

之處，但在從個別學者的深入探討來觀察方面，則能補充既有文獻之不足。另外，相較於過去文獻，本文特別重視澳洲漢學界擁有眾多外地學者此一因素的影響，藉此探究澳洲漢學研究的多元性。

第三節 研究背景

第一項 澳大利亞文化認同轉型

對於澳大利亞文化性格的建立，黃源深在其著作中有精闢的見解¹⁷。他認為澳大利亞的文化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土著文化階段、民族文化階段以及多元文化階段。土著文化即在澳洲延續四萬年的原住民文化，雖然幾近被隨英國殖民的西方文明所入侵與扼殺，但仍對後來澳洲文化的發展存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至於民族文化階段則是從 1788 年英國進入澳洲的殖民文化開始，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演化，才逐漸發展成可稱為「澳大利亞文化」的相對獨立性格。就在其移民社會豐富內涵以及開放發展的趨勢下，澳大利亞民族文化多元性漸成為其文化社會的重要成份。自 70 年代起，這種對多元寬容態度的提倡，便成為澳大利亞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方向。黃源深認為，澳大利亞的當代文化表現在社會層面上是粗獷豁達、平等實際、物質文明、浪漫無羈。這種民族文化融合了寬容多元的精神，在多元異種文化刺激下而能綻放出豐富的生命力。

18 世紀經歷圈地運動¹⁸及工業革命的英國，大量的農村人口為了謀生而集中到都市。然而過度擁擠的人口以及高消費使得謀生並不容易，都市裡出現了大批窮苦的勞工及貧民。面對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與尖銳摩擦造成各種社會問題，都市裡犯罪率不斷上升，英國政府的對應方法則是不斷加重及擴大刑罰嚴懲以期嚇阻。為了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及都市人口過度擁擠的問題，英國政府開始將囚犯流放至美澳等地，且往往將底層民眾所犯的輕罪加重判刑以符合流放標準。如此作

¹⁷ 參閱黃源深、陳弘，民 83（1994），《從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亞文化簡論》，浙江：人民出版社。

¹⁸ 15 世紀末開始羊毛價格不斷看漲，畜牧業成為當時最賺錢的項目之一。在英國的王公貴族以及新興的商人資產家等開始圈佔土地以畜養綿羊，起初佔據公有地後來更擴及鄉下農民的土地，使得大批農民無以為生只好流入都市尋找生存機會。

法一方面可以舒緩都市人口壓力及社會問題，二來又可以拓展海外殖民地。

由於在北美爆發脫離英國的獨立戰爭，澳洲成爲英國政府繼北美之後替代流放罪犯的地方。1788年，英國派出由菲利浦提督（Arthur Phillip）率領的第一艦隊載來首批移民抵達澳洲，罪犯及軍人構成了澳洲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員，其後在澳洲發現金礦後及移民獎勵政策下，自由移民才逐漸成爲多數，直到1868年全澳廢除流犯政策爲止，英國已經在澳洲流放多達168,000名罪犯。在今天，一般便以1788年作爲現今澳大利亞聯邦創建所能追溯到最早的一年。¹⁹

這種罪犯流放史的經驗，對澳大利亞民族的集體心理可能構成了深層的影響²⁰。1788年1月26日，菲利浦提督在雪梨灣（Sydney Cove）舉辦了簡單隆重的典禮，宣告英國新南威爾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後來更成爲澳大利亞聯邦的國慶日。然而對今天的澳大利亞人民而言，1788年並不是一個純然榮耀的一年。1788年是英國正式將勢力伸入澳洲建立殖民地，同時也是首批發配澳洲之流犯抵達的一年；它象徵的是英國的榮耀，而不是澳大利亞的榮耀。和懷抱夢想前往美國的清教徒相比，這些澳大利亞早期的移民特質也不一樣。這些早年來到澳洲的人們並非爲尋找新天地而來，而是一群被英國政府及社會所放逐到遙遠荒陸的有罪之人和社會底層民衆，他們是被迫待在澳洲的一群無奈的英國人。在這個背景下早期移民澳大利亞的群體自然較難積極發展出獨立的自我價值及榮耀，他們的榮耀理當來自於大不列顛帝國殖民的延伸，然而卻是原本在國內的社會地位、文化、生活水平都較爲低落的一群。²¹澳大利亞在過去對母國的心態可以說是景仰卻隱含有相形自卑的潛意識，這使得他們早年似乎不斷的在尋求英國的認同，並強調以身爲不列顛人的身份爲榮。這種自信的失落讓他們可能特別意識到並強化在面對非西方文明時的優越感。

此外，在澳大利亞的早期移民建立其以白種移民爲主社群組織後，便一直想

¹⁹ 參閱李龍華，民 92（2003），《澳大利亞史：古大陸·新國度》，臺北：三民，頁 29-41。

²⁰ 黃源深、陳弘，民 83（1994），《從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亞文化簡論》，浙江：人民出版社。

²¹ 例如，當時倫敦貧民區是早期從英國到澳洲的主要居民，這種倫敦貧民區的口音成爲後來澳洲英語的主要口音。參閱黃源深、陳弘，民 83（1994），《從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亞文化簡論》，台北：淑馨。

像著一個脆弱的自我²²。這種想像的來源因素很多，除了前所提及的政經歷史發展因素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孤立偏遠的地理位置所致。澳洲的偏遠位置、晚起步的發展、相對稀少的人口，在在都讓早年的澳洲白種移民感到不安，擔心自己被西方遺棄。這種脆弱性的想像帶來不安，使澳洲希望盡可能的以各種方式確認自己居於西方國家，並以身為大英帝國的一員為其歸宿。而在外在物質的聯繫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時常必須依賴母國的接濟，在經濟開始發展後，與英國以及日後與美國的貿易，構成了經濟上最大的支柱，而國防武力在二戰前更是依賴英國的保護。在這種脆弱不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對失落的背景下，澳人便傾向於追求心理上的歸屬感及外部實質上的依賴，導出澳人比其他國家更在意確保自己身為優越西方的一份子，且與強大英美均維持好友。

惡名昭彰的白澳政策便可能在這種心態下成為澳大利亞聯邦成立時的基本國策，對於中國和日本等亞太勞工移民的進入，澳大利亞以白人為主的社群在早期顯得相當憂慮，澳人因為特別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對亞洲移民加以區隔歧視。如前所述，由於在西方世界內的自信相對不足，澳人在面對非西方文化時因而特別易於產生優越感，藉由歧視他們來獲取自信失落的慰藉。雖然身處亞太，但澳大利亞過去在論述上認為亞洲是「另一個世界」，然而由於他們實際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另一個世界」較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像，使得他們對於「亞洲黃種人」可能帶來的威脅特別敏感²³。讓澳大利亞早期在亞洲特別感到威脅的國家有二，一為甫成為新興強國的黃種日本，二為擁有龐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認為是最能代表「東方」的中國。一直到二次大戰後，在澳洲開始轉向多元開放的五零年代以前，澳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從純粹西方國家的角度來想像自己，並透過英美來認識世界。

澳大利亞對母國英國從崇拜並安於其傳統關係，到產生不滿與反思，在歷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為轉捩點。澳大利亞早年在外交上僅關注於與母國的聯繫，對外並未有太多獨立發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度上甚至由英國來代表澳大

²² 參閱Dalrymple Rawdon. 2003. *Continental Draft: 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agional Identity*. Burlington, Vt. : Ashgate.

²³ 參閱Lachlan Strahan. 1996. *Australia's China :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利亞。二次大戰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防線已經兵臨澳洲本土之際，英國首相邱吉爾否決了澳洲朝野的求援請求，還準備將澳洲在中東戰場的精銳第七師軍團調往緬甸支援。在危急時刻澳洲國會通過召回澳洲第七師的決議，出身工黨的總理柯亭（John Curtin）並在激辯中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宣告澳大利亞認為太平洋戰爭對澳洲而言是一場主要的戰爭，澳大利亞應該要有自立的能力，並且在外交上將轉而關注與美國的合作。太平洋戰爭確實引起了澳洲對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利亞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位於亞太的國家，而日本兵臨城下與英國輕視帝國邊陲戰場的態度，強烈刺激了澳大利亞要保衛「自己」的這種想法，促成澳大利亞外於大英帝國的自我獨立意識。

二戰後澳大利亞轉向追隨美國，然而這種追隨已經和過去從屬英國的關係不一樣，澳大利亞和美國在歷史記憶中的政治位階同屬獨立後的英國殖民地，美國像是澳大利亞的一個優秀的兄長。在這個時期，澳大利亞在政治上的主體性已漸嶄露。二次大戰結束後，澳大利亞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和歐美各國有了實質性的政治交流和平等地位。在冷戰格局下，澳大利亞追隨著美國以兩大陣營對峙的觀點來認識世界。1972年，工黨領袖惠特朗（Gough Whitlam）成為澳洲總理，取代了戰後長期執政有著親英美傳統的自由黨，採取了反對越戰等非親美策略，開啓了新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上嶄新的一頁，同時白澳政策也在此時正式被廢除。

不久之後，發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年工黨的經濟政策失誤導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朗向時任總督一職的寇爾（John Kerr）請求參議院改選，而寇爾竟宣布以總督職權解除民選總理惠特朗的總理職務。這個事件確實激起澳洲民眾再次對自我走出英國關係的省思。且在此之前英國加入歐盟的這件事，其實已經對澳大利亞傳統親英的人士造成相當大的打擊。70年代，先是美國反傳統的浪潮影響到澳大利亞新興社會風氣，且各國移民的大量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現實打破了文化一元的情況，澳大利亞政府在80年代宣布採取「多元文化」作為正式的政策方向²⁴。

澳大利亞所呈現的多元性似乎與美國不同，其既想要改變過去依附推崇英國

²⁴ 黃源深、陳弘，1994，《從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亞文化簡論》，浙江：人民出版社。

文化作為唯一主流的立場，然而在自我價值相對薄弱下並沒有很強的主體文化基礎。由於他們不似美國擁有「美國精神」般的也有某種澳大利亞精神，或說澳大利亞精神是在後來才逐漸形成並以開放、多元和自然為期待，因此他們的文化主體性質可能更易接受各種外來的刺激影響。美國文化的多元性是將各種文化吸納進美國這個主體，然而澳大利亞的文化主體則由於沒有強烈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種外來文化更容易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構成，寬鬆開放的文化主體使澳大利亞能去追求展現出一種「世界性」特質的理想。

這種澳大利亞對自己擁有「世界性」期待的理想，除了表現在尊重國內的多元文化共生外，還展現在澳洲對國際事務的態度。澳洲自二戰後便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對事務的意見上，努力表現成超然中立，從一種以世界為考量的高度上去思考。在這種世界性的展現中，澳人可以找到了心理上屬於自己的價值與榮耀。且由於站在這種高度去思考，而使澳大利亞能對以往極依賴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例如在環保、軍事等議題上皆曾與傳統西方國家對立，而人權議題更在白澳政策廢除後成為外交主題之一。澳大利亞對追求世界性的開展和對澳洲自我定位的省思是相關聯的，澳大利亞在走出英國、反省一味追隨美國以及放棄極力確保自己為西方歐洲國家的進程中，開始逐步整理自己的身份定位。這時，澳大利亞的地理偏遠位置反而能有利於在國際發聲時顯得超然中立，而國內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傳統則留下的自然思維等²⁵，皆有利於其對世界性追求的開展。

但這並非說澳大利亞的親英美傳統消失了，事實上無論是親英美策略或者以國家戰略利益考量的態度一直都存在。而在社會上的各種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強勢的主流。英語能說得好，可說是在當地生活獲得尊重的必要條件。白澳政策雖然已經廢除，但部分澳洲白人仍有這種排斥亞裔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想法，白人作為主流優越的印象也仍存在於一些澳洲民眾的心中。1998年由激進種族主義者韓森²⁶（Pauline Hanson）所創立的一族黨（One Nation

²⁵ 和大自然和諧共生等原民思想觀念，與澳洲日後對環保議題的關注聯結。

²⁶ 韓森生於1957年，原為自由黨的議員候選人，在參選期間發表排斥原住民和多元文化等歧視言論被開除黨籍，但由於選票修正不及仍顯示為自由黨員而當選。一族黨參政後吸引到對社會不滿的邊緣人支持，但每月都遭到抗爭。韓森也爆發多則政治金錢醜聞，在支持率不斷跌落下解散。

Party)，主張排斥非白人移民，尤其針對影響日益增加的亞裔文化，該黨竟在當年的選舉獲得 89 席中的 11 席國會席次。雖然一族黨後來遭到不分族群許多民眾的多次抗議並衰微解散，但可知種族主義思維仍然存在於澳洲，並可獲得一些支持。

這種擁有多元性、開放性、世界性的自我期待，似乎存在於一個理想性的澳洲想像中，也一定程度落實在各學術領域之中。就中國研究來說，這些期待會反映出何種風貌呢？

第二項 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

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觀感也經過了數次的變化，²⁷澳洲學者斯特拉恩(Lachlan Strahan) 認為澳洲在理解中國到底是甚麼樣的角色時，其實也部份的回答理解澳洲的身份。二次大戰以前澳洲在西方認同觀點下，對中國感到輕蔑卻又具有威脅性，從而在外交關係的思考上是忽略中國的。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這種態度，與前所提及的歷史背景與集體心理層面有關。首先，中國在西方世界裡有著「最東方」的印象，也就是說中國對許多西方人來說，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過去會想像是富強的黃金國度，然而隨著歐洲物質文明快速發展帶來的自信，實際接觸後的中國往往被聯結許多負面的印象，例如腐朽、陰險、墮落等。

澳洲在自身脆弱性的想像以及自信失落的情況下，對於鄰近的異世界中國便特別敏感。於是澳洲一方面歧視黃種中國人，另一方面又常有「滿清皇帝有意南侵」或者「黃種人想要取代竊據澳洲」的這類耳語流傳。這種異世界認知的影響相當深遠，一直到澳洲能真正思考自己是否應完全堅持獨尊西方文化正統，隔閡才有所改善。二次大戰時期，雖然因為與中國的盟友關係而使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印象稍趨好轉，然而隨著冷戰格局的開展，很快的又再次對中國採取敵對威脅的認知。

²⁷參閱Lachlan Strahan. 1996.*Australia's China :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3.

七零年代末的中國經濟開始起飛，一種來自實質利益的聯繫，令澳大利亞以知識界為首的各界，開始認真思考澳中之間的關係以及澳大利亞要以何種身份自居。亞太經濟日益重要的趨勢，使得澳大利亞不再堅持自己要做為一個歐洲國家，而可以重新省視自己所處位置的重要性。澳洲在 1990 年代與東亞地區的貿易已經成為澳洲最大的市場，外在實質關係的改變影響了澳大利亞對身份認同的思考。有學者曾分析，中國研究之所以在近年成為國外的顯學，其背後的因素是西方世界所謂「中國崛起」這種思考，這個思考自覺或不自覺的影響改變了它們的中國認識²⁸。如果這個說法可以成立的話，便也可以說澳洲因為其歷史經驗條件，而使「中國崛起」這個思考對自身造成了更深的影響。

第三項 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發展背景

1918 年時，澳洲在雪梨大學成立東方研究學系（Dept. of Oriental Studies），其中的中文計畫即開啓了澳洲對漢學的研究，惜因人才難覓而使該系一度停開²⁹。澳洲的中國研究興起始於 60 年代，雪梨大學在 1955 年恢復東方研究學系，而許多新建大學亦將當代中國的研究納為亞洲研究院系重要的部份。60 年代，澳洲開始推動中國研究有兩個主要的緣起。在經濟方面，澳洲的工商界及輿論界認為，日益重要且龐大的中國市場將會對澳洲未來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在政治方面，澳大利亞跟隨美國學術界所領導的比較政治研究³⁰，在冷戰格局下從「了解敵人」這樣的角度開啓了對中國的重視，並由學者進一步呼籲政商領袖能放棄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³¹

80 年代中期是澳洲中國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轉捩點，東亞及東南亞社會經濟的急速發展讓澳洲政商領袖意識到，積極參與澳洲所屬的亞太地區，將是澳大利亞在下個世紀能否存續繁榮的關鍵。在各相關亞洲研究協會的報告強烈建議

²⁸ 崔中則，〈國外中國研究與世界的中國性〉，《中國圖書評論》網頁。

<http://www.cbr.org.cn/mag/articles/0709/1323.html> (06/07/09)

²⁹ 劉涓平，1995，〈漢學研究在澳洲〉，見林徐典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歷史哲學卷》，北京：中華書店，頁 244—250。

³⁰ 美國在 60 年代開始進行有系統的區域研究、比較政治研究，這樣的研究與國家戰略考量有著密切的關係並得到各界的資助，各區域的研究專家對政府的該區域政策決定有著相當的影響力。

³¹ 何培忠主編，2006，《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第十章：「澳大利亞的中國學」p350-p379，北京：商務印書館。

下，澳大利亞政府開始將亞洲研究列為國家重點，並有系統的以政策措施投入大量資源支持中國研究與漢語教學。胡珀博士的研究報告指出：80、90年代中國研究計畫在澳洲大量增加，教授漢語的大學從1988年的13所增加為1996年的30所。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及，現今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取得了優秀的成果，在許多研究領域都有傑出的學者，受到各界的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在發展中國研究之初，由於相關研究、教學人才的缺乏，因此相當仰賴外國學者的支援。這些被澳大利亞延聘的外國學者主要可分為兩類：一、來自歐美研究體系的學者。二、來自華裔背景的學者。

這些來自外國的漢學家在澳洲發展漢學研究之初，作出了奠定基礎、培育研究人才等貢獻，並且形成了澳洲漢學研究中重要的力量。以澳洲中國研究的重鎮澳洲國立大學為例，1953年澳大成立遠東歷史學系，即以來自英國的費子智（C. P. Fitzgerald）出任首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³²1967年費子智榮休後，由來自新加坡華裔背景的王賡武（Wang Gungwu）接任系主任，在他領導下的遠東歷史學系時常舉辦學術研討會，且邀請海外知名學者來澳訪問交流，讓澳大享有聲譽，王賡武後來更曾任澳大太平洋研究院院長及澳大利亞亞洲研究學會³³會長等重要職位，並於1982年榮休。而在1952年成立的東方語文學院³⁴首任講座教授為瑞典知名漢學家華漢思（Hans H. A. Bielenstein），繼任者為同樣來自瑞典的漢學家馬悅然（N. G. D. Malmqvist）。1965年來自香港的柳存仁（Liu Tsun-yan）繼任為講座教授，他在澳大任教將近30年的時間，和來自英國任教於雪梨大學的戴維斯（A. R. Davis）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主導著澳洲中國文學研究的思路，其學生有當代著名的澳洲漢學家馬克林（Colin Mackerras）。³⁵

³² 馬克林原著，劉明新譯，1997，〈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研究〉，《世界民族》，(2)：78-81。

³³ 澳大利亞亞洲研究協會於1975年成立，中國研究一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1989年在中國研究日益發展下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正式獨立出來成立，目前約有200多名會員。

³⁴ 澳洲國立大學的大學部前身為墨爾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分校「坎培拉大學院」（Canberra University College），1960年正式合併。爾後東方語言學院改名為東方研究學院，1961年成立中文系等四系，70年代東方研究學院再度更名為亞洲研究學院，1983年改組解散各系，成立中文中心等五個研究中心。

³⁵ 見何漢威，1983，〈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3)：185-191。

其它較著名的華裔學者還有如早期雪梨大學的劉渭平（Weiping Liu）、當代的雷金慶（Kam Louie）、何包鋼（Baogang He）、陳佩華（Anita Chan）、黃宇和（John Y. Wong）等；而較著名來自歐美的學者還有如本文將深入探討的安戈（Jonathan Unger）以及范乃思（Peter Van Ness）等。

胡再德所發表的《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研究》，對於澳洲中國學發展的整體歷史有更完整的介紹。其間外國赴澳學者一直都扮演重要角色，至今更和澳洲本土的漢學家共同構成澳洲的中國研究團隊，一起創造了澳洲優異的中國研究成果。那麼，這些來自不同背景的外國學者，他們的研究角度與關懷呈現出甚麼樣的特色？又他們和澳洲本土的學者有何異同？「澳洲」這個環境又是否影響到他們的研究？這將是本文要繼續觀察的一個重點。



第一項 安戈的背景簡介

安戈（Jonathan Unger）出生於 1946 年美國紐約市，現為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曾擔任中心所出版著名中國研究期刊*The China Journal*的主編。安戈在中國農村的研究上卓有聲譽，作品同時能受到西方和中國、華人研究圈的高度重視。安戈的夫人陳佩華（Anita Chan）則在中國的勞工問題上有許多深刻的研究，例如代表性的專書*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中國勞工在全球化經濟下的被壓榨）³⁶，深入分析了當代中國勞工的困境，在各界得到很高的讚譽。兩人對於中國的基層社會、社經結構等問題研究上迭有合作，在中國研究領域內獲得很高的評價及知名度。

安戈在作品中常流露出對社會基層弱勢人群關懷的豐富情感。這當然與他具

³⁶ Anita Chan.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M. E. Sharpe.

理想性的性格也有關，在對安戈的一次訪談中³⁷，安戈即談到自己年輕時參加左派運動的回憶，並表示如果同樣的情況在今天發生他還是會不猶豫的投入。這種理想關懷的特性時常出現在他的文章中，並與他曾接受過的社會學訓練背景相輔相成。安戈對中國的認識建立在實際與相處生活的經驗上，因此能更深刻的體會許多華人的思考方式。他在柏克萊學習中國研究時即不滿足於只從理論、數據來認識中國的方式，因此才有旅居香港的決定，在實際與華人世界接觸之初，帶給他很大的震撼。安戈更有一位來自香港現在同為澳大教授的夫人陳佩華，兩人時常在大陸共同從事研究觀察。安戈在第一次旅居香港在新聞社工作時，認識了陳佩華，進而結為連理，兩人也成為在人生及研究上支持彼此的伴侶。安戈在華人世界長時間的生活，讓他能提出許多對中國深刻的觀察，不管在國外或是中國大陸都受到重視。

第二項 何包鋼的背景簡介

何包鋼（Baogang He）出生於1957年中國內蒙古的包頭市，目前為澳洲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國際關係學系教授。何包鋼在中國民主化的議題上在有很高的國際知名度，且是位相當多產的學者。除了在學術界的研究外也積極參與實踐事務，近年則以在中國推動協商民主研究的實驗聞名。

何包鋼是一位富理想熱情的學者，他推動中國民主化的理論及實踐均不遺餘力，並且活躍於國際舞台及公共場域，曾數次接受聯合國邀請擔任對中國項目的評鑑，也時常接受各國媒體邀請評論中國問題。何包鋼的知識背景以自由主義哲學作為基礎，1988年即曾和同窗何懷宏、廖申白翻譯當代政治思想名著「正義論」³⁸的中譯本，而在日後何包鋼的文章中也時常出現對羅爾斯的引用或討論，可見羅爾斯在其思想中的特殊地位。但何包鋼也曾自承，在個人思想信念上自己是在自由主義及平民主義（populist）間游移。在進入人民大學接觸到自由主義思想之前，年輕時代的何包鋼曾為當時在中國所流行的平民主義式基進民主論述

³⁷ 2008年12月15日由筆者以網路電話連線的方式與當時身處香港的安戈進行了一次訪談。爾後於2009年4月與研究團隊赴澳洲訪談了安戈和何包鋼及其它數位重要的澳洲中國研究學者。

³⁸ 作者羅爾斯（John Rawls）於1971年出版，英文名為 *A Theory of Justice* 為當代自由主義經典書籍，引起巨大的迴響與討論。

所著迷。近年何包鋼則戮力於在中國進行協商民主的推動，除了在中國農村舉辦數次協商民主懇談實驗外，也在澳洲指導地方政府組織協商民主的會議，其積極參與的程度可見一般，是這個新興領域中最著名的學者之一。

第五節 研究架構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文本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並以書信問答等方式作為輔助。文本分析幫助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生活情境，是一種研究在地化的方法。首先從既有文獻、紀錄去觀察研究對象所遭遇的問題及其關切，經由進入研究對象的情境來體會研究對象所遭遇到的問題、困難及可能的感受。下一步則是與研究對象共同答覆他想要處理的問題，回溯他問題意識形成的脈絡，亦即研究對象的問題意識史。³⁹

深入訪談則要求研究者進入受訪者情境，由受訪者帶領研究者去經歷受訪者所關切的問題，或可稱為「神入」或「移情」，本文所作的訪談在方法論上採用的是「口述歷史方法」。依Donald A. Ritchie的定義，現代口述歷史方法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而口述歷史訪談是指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並且以錄音或錄影記錄彼此的問與答。」⁴⁰ 口述歷史方法以收集人們言談為主要目的，這種方法在人類歷史中很早就出現，例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便有以蒐集耆老言談的方式來寫作名人傳記，而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也以蒐集人們對事件的敘述來寫作紀事。口述歷史雖然可能因記憶等問題有所失誤，但能避免強調文獻考證的學院式史學方法對歷史詮釋壟斷，並可取得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⁴¹。雖然「口述歷史」一詞在西方很早就出現，但是該詞和「訪談」的結合則是在一九四零年代的美國才開始普遍。歷史學家Allen Nevins於一九四八年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³⁹ 參閱石之瑜，《政治心理學》，民國88年（1999），台北：五南出版。

⁴⁰ Donald A. Ritchie原著，王芝芝譯，1997，《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

⁴¹ 鐘保賢，2000，〈口述歷史的社會意義〉，《當代史學》，3（3）。

University) 創建第一座現代口述歷史館，並提倡口述訪談等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使用。

Donald A. Ritchie 認為開展口述歷史計畫，應先決定欲建立的資料類型及目標，且應著重於發掘檔案、資料所未記錄的訊息。而在訪談的過程中，有可能會改變或需要重新評估原來的目標，並隨時因應情況變化訪談內容。在正式訪談前的籌備階段，訪談者應先熟悉針對議題或對象的既有資料及背景，並且最好能夠先與受訪者有過初步的接觸，並盡可能為訪談行程作完善的計畫。在問題設計方面，可分為開放性問題和有明確答案的特定性問題，理想上應將兩種問題混合使用。以開放性問題引導訪談，可讓受訪者在敘事思考時有充分的自主權，並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們表達自己認為重要的資訊；而特定性的問題則可以得到事實性的資料，通常是針對受訪者在回答開放性問題時不清楚的部分提出。

而訪談者應扮演的角色，是個在方法論上有爭議的問題。Allen Nevins在哥倫比亞創立的口述歷史模式，要求訪談者盡可能的中立，並減少對受訪者的干擾，忠實呈現受訪者自身的記憶與表述。另外一些口述歷史學家則將訪談者視為有力的觸媒，承認訪談者的主觀性在訪談過中是不可避免的，並且需要對受訪者的敘述作出詮釋。Michael Frisch則提出訪談者與受訪者共同在訪談創作上負有責任的新觀點，認為受訪者先經自我詮釋提出敘述，而訪談者則再對此敘述作第二次詮釋。正式進入訪談後，Donald A. Ritchie認為訪談者應保持友善專注的態度，也必須展現學術存疑精神，對疑慮之處要有思考判斷的能力。⁴²

筆者於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澳洲國立大學與安戈進行深度訪談，並在同月二十七日於澳洲迪肯大學訪談何包鋼。在正式訪談前，先以電子郵件的形式與兩位學者有過幾次事先接觸，告知本文研究旨趣及訪談方向，並請益學者在研究澳洲漢學問題上的建議，建立初步的信任基礎。另外，本次澳洲參訪還另外訪談了數位澳洲知名漢學家，希望能藉此更加掌握澳洲漢學研究的概況以及觀察澳洲

⁴² Donald A. Ritchie原著，王芝芝譯，1997，《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

漢學界的環境氛圍⁴³。在研究問題的設計上以開放式問題為主，在受訪者論述中較不清楚的地方再針對特定性問題追問。訪談的題目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學者個人經歷，請受訪者談談自己的學經歷以及相關的重大事件，例如選擇中國研究的原因、研究思考的變化以及研究經驗。另外針對學者敘述也對題目隨時調整，例如在安戈的部分詢問他造訪中國的經驗，而在何包鋼的部分則加強訪談他選擇停留澳洲時的心境。另外，亦有如澳洲或中國對當事者的意義這種測試性的開放問題，觀察當事者的第一反應及聯想。第二部分為學者對澳洲漢學研究的看法。這類問題除訪談無法從文獻紀錄上找到的資訊，例如澳洲漢學界的研究氛圍及學者社群的概況等事實論述外，也可從受訪者對澳洲漢學研究的評價及在當地從事研究的感受，剖析受訪者在當地的處境概況。最後，第三部分則針對學者個人的研究問題，以事先對學者的著作閱讀為基礎，在訪談時提出討論，並請教學者對研究議題最新發展的看法。

在實際與安戈進行訪談時，有幸能邀請到他的夫人陳佩華共同參與整個訪談過程。在對同一問題的回答上，有時可以觀察到兩人反應的差異。而遇到共同回憶的問題例如兩人認識的過程，也由於兩人的互動而使得氣氛能顯得更為輕鬆有趣。在與何包鋼的訪談裡，當正式訪談結束後，何包鋼仍熱情招待午餐，因此能在席間作更多的追問。此外，自澳洲返台後，筆者也持續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和兩位學者保持聯繫，並在信中確認訪談裡不清楚的細節。

第二項 章節安排

本文試圖分別從微觀與宏觀兩方面，對個別學者深入研究，並對澳洲整體文化與環境觀察澳洲的中國研究。本文第二、三章分別介紹兩位學者的生平、學術

⁴³ 此次參訪共訪談十二位學者，分別為馬克林(Colin Mackerras)、鄧利傑(Luigi Tomba)、安戈(Jonathan Unger)、范乃思(Peter Van Ness)、白杰明(Geremie Barne)、史林(Graeme Smith)、班杰明(Ben Hillman)、杭智科(Hans Hendrichske)、Louise Edward、古德曼(David Goodman)、何包鋼(He Baogan)及陳佩華(Anita Chen)。

境遇及經歷。其次，本文將介紹兩位學者的研究思想的基礎架構及方法論並整理他們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特色，本文歸納出「中國轉型」及「農村研究」兩個面向作為比較議題，最後並對兩位學者的中國研究與其思想架構、境遇、環境等作聯結性的綜合分析。第四章將就澳洲中國研究領域中較具影響力的幾個方法論上的主張及整體學術環境氛圍作介紹，期能從整體性的角度分析影響澳洲中國研究多元性的因素及待探討的特色。這些觀點分別是地方研究（Local Studies）、後漢學（New Sinology）以及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在各研究主張的介紹中，將從代表性學者的觀點來討論，也藉此觀察澳洲漢學研究之特色。第五章本文將先對安戈及何包鋼兩人的境遇與研究再作一次整體性的綜合比較，期能發掘出研究者身份、研究論述以及澳洲之間的關係。在最後總結部分，則將議題再次拉回到澳洲漢學研究的多元性特色，並認為澳洲的漢學研究環境雖寬鬆多樣，但仍籠罩在某種西方屬性的薄紗之下，厥為薄紗下的多元。



第二章 安戈的中國敘事

第一節 安戈的個人及學術經歷

安戈 (Jonathan Unger) 出生於 1946 年，在美國的紐約市成長，並在奧立岡讀大學，但他的大學時代並非主修中國研究。在安戈的大學階段適逢美國新左派運動興起的時期，青年時期的安戈也投身運動之中，和大學同學參與了反對越戰的左派運動團體。準備研究所時，安戈對於當時在美國資訊極少的中國產生好奇，因此選擇進入加州柏克萊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從此開始他的中國研究生涯。爾後安戈決定實際接觸亞洲，在經歷一段旅行後選擇停留香港，並以《遠東經濟評論》雜誌社約聘記者的身份在當地工作。兩年後安戈決定再次回到學校，這次他選擇在倫敦大學主修政治科學。一年後安戈因故轉到薩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ussex) 攻讀博士，並修習社會學，還參與校內關於中國教育研究的計畫，後來並再至香港以訪談的方式開始其中國社會及基層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後，安戈曾經先後在堪薩斯大學 (University of Kansas)、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以及荷蘭的萊登大學 (Leiden University) 教過書。最後在時任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王賡武的邀請下，赴澳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任研究成員並成為該中心負責人至今。他在 1987 年到 2005 年間擔任中心出版的雜誌 *The China Journal* 主編，該雜誌在安戈以及同僚的努力下取得傑出的成果，成為中國研究領域中相當重要的期刊。

雖然無從得知是否有更深層的幼年成長經驗引發安戈對中國的興趣，但起碼自大學時代起，並非主修政治的安戈，懷抱著理想參與的左派運動浪潮，正讓成為青年之後的安戈開始接觸到較多有關「中國」的想像。

發生於美國六零年代的左派運動浪潮，又稱為「新左派」運動，並產生了一批年輕的「新左派」知識份子。新左派運動是以大學生為主要參與者的社會運動

浪潮，根據 1960 年美國《幸運》(Fortune)雜誌的統計，約有 75 萬名大學生認為自己是參與「新左派」的一員。⁴⁴ 新左派的訴求是對現實不滿的社會主義理想，國內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黑人民權種族平等運動、美國參與越戰的殘酷畫面等都是新左派形成的原因。新左派對中國的充滿理想和同情，由於當時中國對外封閉，外國僅能從少許的官方資訊、新聞以及過去歷史記載來認識中國，在新左派的想像中，中國是個努力革新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新興國家。除了知識上對神祕的中國感到好奇之外，安戈對中國產生興趣的原因可能與此相關。六零年代作為大學生的安戈也參與在新左派運動中，如前所述加入了一個在校內的左派青年團體。安戈曾談到，當時他對中國感到興趣，是因為在美國沒有人真正知道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究竟是如何。雖然無法斷言安戈是一位左派學者，但他的日後的研究確實展現出普遍性的左派關懷，積極為弱勢者發聲。

旅居香港的經驗是辛苦的，安戈在香港的小報社裡只是論稿計酬的約聘人員，常需耗費精力熬夜趕稿，且薪資低廉只能勉強支付生活所需。但這也是第一次安戈能深入且長期的體驗華人文化，與華人互動，並且在這裡認識了日後的夫人陳佩華。安戈在一場露天電影放映會中邂逅了她，開啓了往後數十年陪伴彼此人生與研究的道路。日後兩人不僅共赴英國取得博士學位，並且在學術研究、任職、田野訪談、雜誌編輯工作一直合作陪伴彼此，並有卓越的成果表現。

安戈描述陳佩華教授是位思辨反應能力敏捷的才女，她在大學時代便嶄露出才華，並能說相當流利的英文。但大學時代的她原本主修的是地理，在認識安戈後才逐漸開始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她的個性直率爽朗，且和安戈同樣擁有理想熱情的性格。她的研究作品並不常套用理論來解釋研究，在訪談中她表示在議題選擇上，她去從事某項研究，是因為自己認為那件事是重要的。這種不套用理論

⁴⁴溫洋，1988，〈美國六十年代的“新左派”運動〉，《美國研究》，(3)。

解釋的方法和安戈是類似的，並且兩人都敢於批判及關懷弱勢。對她而言，中國是一個她想要盡一份力去幫助，但又不是十分親切的地方。在香港受教育成長的記憶中，中國被認識成是落後恐怖的地方，在中國文革期間還目睹來自中國的河川每天都會漂出幾具屍體到香港。受西式文化教育薰陶的陳佩華對中國的情感可能是複雜的，一方面她並不喜愛當代中國的環境條件，但又想為自己在中國受苦的弱勢同胞作出幫助改善。陳佩華對安戈的中國研究影響毋庸置疑是很大的，而彼此的陪伴也讓許多辛苦的研究過程變得有趣。關於兩人在學術研究上的關係，將在本章第五節作更多的討論。

安戈在 1971 年旅居香港期間以報社記者的身份，帶著興奮與期待的心情第一次真正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形容這次的旅程所見讓他感到「震撼」。由於這是一次由中國官方人員所帶領的參訪，所以在旅程中並沒有太多的機會能與當地人作非制式安排的互動。物質及生活條件的貧瘠雖然已曾有耳聞，親眼所見仍直接衝擊他過去對中國的想像，而人民、政府、社會氛圍也和在美國時所想不同。雖然日後每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都有些不一樣的感覺與收穫，且也對中國近年物質文明飛快進步的速度感到驚訝，但安戈坦言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第一次造訪中國的旅程，不過後來中國的快速改變也讓他有很深的感觸，初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由於社會封閉，村民人山人海的聚集起來要看他這個外國人。但 1990 年當他到雲南偏遠地區中的一個苗族村落做研究時，當地人們卻因習以為常的看到外人而不感到驚訝。也許這種巨大的衝擊經驗，也對安戈日後的研究論點顯得較為謹慎的態度有所影響，需要經過充份的實地觀察或訪談了解後才發表作品。

1987 年時任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的王賡武到安戈以訪問學者身份所在的荷蘭萊登大學作學術交流，會後兩對夫妻在安戈的家中一夜暢談交換想法後，安戈決定赴澳的契機從而開啓。對安戈夫婦相當欣賞的王賡武提出了邀請安戈與陳佩華至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的想法，爾後在兩人的

商量同意下，欣然於 1987 年中赴澳大開始了在澳洲的學術生涯。澳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環境，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安戈可以專心的從事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議題。澳大環境清靜雅適，其所在的坎培拉市是一個人為規劃的行政首都，僅有三十萬的人口。而著名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則是由數間相連的小木屋所組成的，簡單開放的空間與其它著名的研究機構所給人的印象大相庭徑。學校所給予的壓力與規定也相對的較少，並且沒有很強的學科分門（discipline），在這裡作研究時所感受到的限制也比在美國時來的小。由於英語是澳洲主要的語言，因此在溝通上不會有問題。而同儕來自世界各國，也讓安戈與陳佩華兩人能良好適應，並沒有感覺到自己是外來者。

成為 *The China Journal* 雜誌的合作編輯是另一件安戈在澳洲研究的生涯裡的重要經歷，陳佩華及安戈都曾先後擔任主編的職務，但該雜誌的編輯工作其實較傾向合作編輯，並沒有很強的權力關係。*The China Journal* 1995 年以前的原名為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澳洲中國研究雜誌），而這次的更名即為安戈及編輯夥伴所主導的決定。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名稱最大的差異是在於「澳洲」的字樣是否出現在雜誌的名稱上，故也是一次雜誌的再定位。雖然後來事實證明安戈等人的努力及方向是成功的，*The China Journal* 在學術界取得極佳的成果，與 *The China Quarterly*⁴⁵ 成為兩本在世界上以英語發行頂尖的中國研究期刊，但這次的更名過程中其實是有引起爭議，若干本地學者反對將「澳洲」的從刊名上消去。

整體而言，安戈的研究生涯大致順利，由於安戈早自七零年代起就在香港從事當時還很罕見的深入訪談研究，因此自始享有聲譽。安戈的研究生涯中有許多的旅居經驗，最後則在澳洲定居。但同時安戈與陳佩華也在香港有居處，常常會回到他們在香港的家。以安戈及陳佩華在澳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經驗視之，澳

⁴⁵ 創立於 1960 年，由倫敦大學亞非研究中心編輯出版。

洲確定提供了一個舒適的環境，安戈現今也仍擔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

第二節 安戈的思考架構及研究特色

第一項 研究方法特色

由於安戈兼有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的學習背景，因此在他的研究中也呈現出某些這樣的特色。安戈的研究方法以深入訪談與田野調查為主，常前往中國及香港等地作長時間的駐點研究。在研究取向上，以了解實際狀況為主的觀察研究，在他的研究作品中佔了相當大的部分。這個傾向從安戈在柏克萊大學攻讀碩士期間就已經顯現，安戈在柏克萊研讀過許多中國研究的作品後，漸漸不滿足於書籍上的理論解釋，而渴望能夠實際去接觸中國的真實狀況。由於七零年代初的中國仍處於對外封閉的狀態，外國極少有人能進入中國，且資訊流出受到嚴格管控，因此在美國鮮少有人能知道當時中國的實際資訊。也因為資訊稀少造成研究的困難，使得當代中國的研究並不興盛。外國的研究者僅能從少量的數據資訊以及較概略的大型事件等分析，並且在對社會主義國家研究的框架下，進行理論分析。在安戈研究的初期由於無法進入大陸，因此以在香港所進行的深入訪談為主。安戈和陳佩華及其他研究夥伴與從大陸內地、農村逃難至香港的人進行訪談，並和他們成為朋友，這些經驗及聽聞成為安戈了解中國實況最初的基礎。安戈認為田野調查與訪談方法各有其功能，例如田野調查雖有助於實地體會當地情況，但卻無法完全取代訪談。中國內部政治敏感性及外國身分等因素，都使他們得到與在香港受訪者較無禁忌的討論有所不同的訊息。這種長期與中國實際接觸的經驗，也是安戈的研究被各界重視的重要原因。著名的*Chen Village :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中譯本為《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

制下的陳村》)⁴⁶這本書由陳佩華、安戈以及曼德森（Richard Madsen）共同完成，於1984年正式出版，書中生動重現一個近代中國農村的經歷，因此獲得極大讚譽。

但這並非說安戈的研究全然不重視或排斥理論，只是安戈認為理論要基於對實際情況的瞭解為基礎。檢視安戈的研究作品，會發現「理論」許多西方漢學家的理論觀點，安戈常以實地研究的觀察經驗予以否定，其重要依據是事實的發掘。安戈的訪談觀察較傾向社會學方法，並不以理論先建立觀察框架，而以實況觀察為先，然後再與理論對話。總體言之，安戈的作品中與理論建立關係緊密的並不多。以安戈與陳佩華在1995年所發表的“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中國，統合主義與東亞模式）⁴⁷為例，這篇文章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將走上某種東亞式的統合主義社經模式，所根據的是對當地民間團體、政府單位以及公私營企業所作的訪談觀察，再與東亞的其它國家比較後推論的。理論在安戈的研究中鮮少主導，而是事後選用來形容當地的實際狀況，安戈在方法論上並沒有試圖去建立社會科學通則這樣的傾向。

第二項 安戈的研究思考脈絡

在第一章曾經提過，安戈的作品時常流露出人性關懷，這是他研究的出發點。安戈在初期的研究動機，多少出於對中國資訊缺乏的神祕感，也許混雜著一些想像與憧憬。在實際並長時間與來自中國文化背景的人接觸後，開展了對中國的情感。安戈與他的研究對象並不只是單純的研究者與研究客體的關係，從早期在香港訪談包括從陳村等中國內地出走的人們，到後來在中國國內與農民、勞

⁴⁶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⁴⁷ 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 1995.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 29-53.

工、知識份子、民間團體及政府單位的訪談，安戈和眾多研究對象成爲了朋友。因此對安戈而言，研究中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在客觀結構中的一個客體或理論中的角色。他的作品時常帶有情感，對人們所遭遇到的困難和痛苦流露出關懷，也試圖提出政策建議解決問題。安戈在漫長的研究生涯裡，這種對中國研究關懷的態度上不曾轉變。在初期的研究有較多是出於知識的喜好與對中國的好奇，然而在建立與中國的情感關係及了解人們所遭遇的問題困難時，便開始有更多是出於對人們的關懷而寫。

安戈以實際了解及對人的關懷爲研究動機，因此不仰賴一個很明確的研究結構，他對中國的看法隨著他實地看到中國的變化而定。但可以從安戈過去的研究作品中，分出三種性質的研究，但這不是說他的某項作品只屬於某類性質的研究，而是可以歸納出這三種功能。

第一種是觀察瞭解性的研究，這種性質的研究構成了他一切研究申論的基礎，對事實的實際瞭解與觀察可說是他研究架構中的最基本的主要部份。也因此，安戈在研究中花了最多的時間和篇幅在掌握、釐清事實的工作上，這也是在他從事對中國的研究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安戈的研究作品中屬於第一類含有「釐清事實」性質的是份量最多的，反映了安戈對這個工作的重視。這種性質的研究除描繪真實樣貌以及作爲申論依據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即作爲安戈與其它西方學者對話時的基礎素材，有包括七零年代在香港訪談所得素材發展成的一系列農村研究，如 1979 年“China'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遭遇麻煩的中國下鄉動員）⁴⁸、1982 年“Grey and Black: The Hidden Economy of Rural China”（灰與黑：中國農村的隱藏的經濟運作）⁴⁹、1985 年且一直到現在

⁴⁸ Jonathan Unger. 1979. “China'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Contemporary China* 3(2): 79-92.

⁴⁹ Jonathan Unger. 1982. “Grey and Black: The Hidden Economy of Rural China.” *Pacific Affairs* 55(3): 452-71.

都有持續更新改版的*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中譯：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等。

第二種是進一步的對問題作結構性的分析，並有政策建議的功能。這是基於第一種研究所蒐集到的素材及問題，經由研究的經驗累積來分析問題，並且提出對官方政策上的建議及提醒，期待對這些社會問題能發揮實質的影響力。其實在安戈累積了長久的經驗後，觀察瞭解性的研究通常也就併有結構分析。這類作品特別意識到要與中國的官方及知識份子對話，呼籲人們能夠重視弱勢者所遭遇的困難，並且以實際深入觀察的研究來作議題及政策的討論。例如 1996 年的“Bridges: Private Busin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橋梁：私有商業，中國政府及新興組織）⁵⁰、2003 年的“Entrenching Poverty: The Drawback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Programs”（根深蒂固的貧窮：中國政府政策與項目的缺陷）⁵¹等等。

第三類是與理論對話的研究，而這種性質的研究也特別意識到與其它西方學者觀點間的對話辯論。在與理論對話的研究中，安戈會特別澄清他所認為某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的誤解。而前面也提過，這些理論對話的基礎仍來自於安戈對現實的觀察與實地的互動、瞭解，且這種第一步的了解不是以先選定的理論為框架。理論是描述性的，是基於事實基礎，因而不是絕對的或普遍的。事實上安戈在作理論的推論預測時相當謹慎，且避免武斷大膽的理論設定。安戈在這類研究中較常作的，是辯駁其它西方學者對事實掌握不夠清晰就提出理論推斷。這類的研究較多出現在中國轉型的相關議題研究中，也牽涉到中國社會、經濟的模式研究。例如 2006 年的“China's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中國的保守中產階級）⁵²，

⁵⁰ Jonathan Unger. 1996. “Bridges: Private Busin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47): 796-819.

⁵¹ Jonathan Unger. 2003. “Entrenching Poverty: The Drawback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Programs.” *Development Bulletin*. (61):2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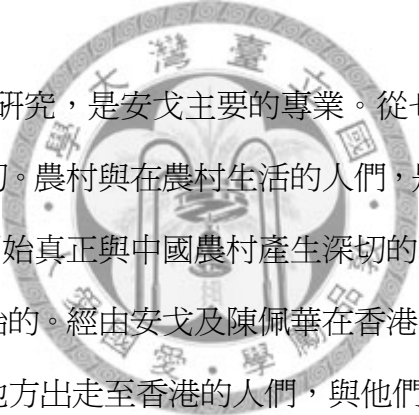
⁵² Jonathan Unger. 2006. “China's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4):

對中產階級有利民主之理論在中國的狀況作澄清。而*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前民主示威在中國：來自各省的報告）⁵³

這本編著，是三種性質並重的作品，力圖釐清在西方吵的沸沸揚揚的天安門事件之意義。

這三種性質的研究，通常同時出現在各個作品中，但是各篇在比例偏重上還是有不同。

第三節 安戈的農村研究



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是安戈主要的專業。從七零年代中期開始，農村就一直為安戈所深刻關切。農村與在農村生活的人們，是安戈想要去深入瞭解並且關心的對象。而安戈開始真正與中國農村產生深切的聯繫，是從七零年代在香港所從事的訪談工作開始的。經由安戈及陳佩華在香港的朋友介紹，他們認識了從陳村及中國內地其它地方出走至香港的人們，與他們進行了長期且多次的訪談，並與其中的一些人成為了朋友。而這些訪談所得的素材，也成為安戈七零年代中期開始一系列中國農村研究的基礎。對安戈而言，與來自當地的人們進行懇切且有效的訪談，到八零年代後，更常態性的進入中國內地，在當地進行田野調查。

可以先從《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Chen Village :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這部經典著作來一窺安戈的

27-31.

⁵³ Jonathan Unger (ed.). 1991.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E. Sharpe and Sydney: Allen & Unwin.

中國農村研究，這部作品比較偏向前一節所提到事實觀察，描繪陳村的人們在中國農村土地上生活的真實樣貌。本書研究主要以訪談方法取得資料，並以田野觀察受訪者互動為輔助。1975年一個偶然的契機，讓本書的三位作者安戈、陳佩華、曼德森在香港認識了幾位來自陳村的青年，並聽他們說了一些過去的佚事，引發三位作者產生進一步了解的興趣。透過受訪者的介紹，作者在1975至1982年間與26位移居香港的陳村村民結識訪談。為檢證資料真實性，作者群交叉比對受訪者對同一事件訴說的細節，訪談總共進行三百多次，三位作者訪談全以中文進行。1989年他們首次得以進入中國內地實地造訪陳村，作為受訪者的朋友以社交的模式進行田野觀察，作者認為有助於對陳村的「感性認識」。

本書寫作模式是以歷史為軸線，敘述陳村從五零年代共產政策到近年改革開放的樣貌，以大型的政治事件、運動發生並影響陳村作為時期的分野描述。在讀本書時宛如在看一場真實的舞台劇，以陳村為舞台，有各式各樣的角色在舞台上互動，在不同時期發生的事件由不同的人擔當主角。然而劇本中每個段落最重要的主要議題，卻不是由這些角色所決定的，而是如安戈所說由遠在北京的政治人物所頒佈發出。除了事件外，在書中相當重視對人物的刻畫，對於村中人物的個性、行爲、態度等都有詳細的描繪。

從《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裡，我們可以看到安戈對中國農民的基本態度是「同情」。而追溯同情的緣由，則是他看到陳村代表的中國農村無法決定自身命運，一直被繫縛在國家所編織的政治、經濟關係的巨網中，這也是本書最重要的結論與觀點。事實上在本書中許多地方都出現了不管是受訪者或作者這樣的觀點，例如前政治領導者慶發因貪吃不要錢的酒席而在回程途中死於車禍，鄉民們大都認為是「活該的，誰叫他一直那麼貪嘴好吃」，還有一個慶發的老幹部說：「如果我迷信的話，我會說是老天的報應吧」。作者對中國農民有一種宿命論的認識，並認為這反映在農民對各種外部而來的運動、政策

的回應。

「他們也日漸痛恨外來強加的各项新政策，希望國家少管閒事才好」（P221）

「一連串行不通的政策，終使農民的善良意願、忍之又忍及易於輕信臻至消耗殆盡的地步了」（P246）

「他們只需如苦行僧般勒緊褲帶耐心等待下一次的政治鐘擺」（P198）

在結尾處作者有這麼一段話：

「那些來自北京的各项綱領法令，無論如何...陳村村民都只得學著應付，逆來順受...捲入了經濟特區召來香港的資本家後以及隨之而來的暴發戶及排場講究文化。外來的力量（無論是政府經濟體制或香港的價值觀）又一度主宰陳村，村民只好再次吃力的學著應付。」

可以繼續延伸討論的是，安戈這種對農民弱勢角色的定位認知，主要是相對於國家政府等高層政治精英的。當然，安戈也觀察到，農民及農村的弱勢因資本主義經濟價值觀進入而體現，但他認為農民的命運及生活受政府的影響是最大的。在引文中可看到，安戈對農民一再受到執政高層所推行的政治運動所煩擾表達同情，並且在他的文章中傳達出希望政府能讓農民「休養生息」的訊息，這是與中國固有農民政策思維相當接近的態度。除了《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之外，安戈對農民這種弱勢被動處境的關切也表現在其它許多作品中。例如在“Family Customs and Farmland Realloc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Villages”⁵⁴（在當代中國農村的家庭習慣與農地重劃）中，安戈談到：

「政府聽從那些由經濟學者所組成的智庫的建議，而那些經濟學者受到西方經濟學家很深的影響...而不是去考量和照顧農民自身真正的渴望。」（P122）

安戈談到的是中國在 1993 到 1994 年的土地重分配政策，其制定是受西方經濟學影響甚深的中國智庫精英所建議。他們並未「屈就」身段聆聽農民真正的需求及偏好，只是以新引進的西方理論如「財產權」、「保護佔有權」等作為依據。

⁵⁴ Jonathan Unger. 2006. “China’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1 : 113-130.

即使這個土地政策改革的結果有缺點也有優點，但可見安戈並不是依西方理論來做為評斷依據，而是希望能就中國農民的實際需求狀況來做改善，並為農民在政策過程中的弱勢地位發聲。

這種同情的態度不僅適用於農民身上，也包括對其他在農村中生活的弱勢者。例如在“China’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中國的「下鄉動員」造成的麻煩) 這篇論文中，分析的對象便是在 1968 年到七零年代中期被強迫分配到農村生活的學生們，文章描述了政策對學生、家長們及農村農民帶來的不便與困擾，並敘述他們如何找政策的漏洞。而當某些農村經濟開始進步，原先農民的生活水準改善後，安戈又將關切的目光移到新起的弱勢族群「農民工」的身上。七零年代大陸改革開放後，是一個資本市場迅速在中國擴散的時代，從窮苦偏僻的農村出來的男女青年、農民開始外出到都市及沿海富裕的村子尋求工作機會。這群一億多的人口被稱為「民工」或「農民工」，他們在當地從事本地人不願作的底層工作。這些人留居當地卻常被歧視，生活困苦，並且不擁有正式的身份和權利。在安戈的觀察中，他們也寧願接受這些較差的工作生活條件，因為至少能因此糊口。由此可知，對於群體中「弱勢者」的同情與關懷，是安戈在選擇關注對象與議題的重要考量。

安戈將「人民」視為相對於「政府」的弱勢，頗與一般左派學者相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安戈對中國政府執政精英並未表現出強烈批判意識，即使批判也是以對農民生活的影響來呼籲。事實上，安戈相當認真的看待中國政府所宣佈規畫的正面政策，不似一些西方學者視之為官方推諉敷衍的口號表演。在一些實際討論到中國農村政策及其執行的論文中，安戈肯定中國政府及執政精英想要改善農村處境的努力及意圖，但對於實際執行的效果與結果則提出觀察及評議。例如在 “Entrenching Poverty: The Drawback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Programs”⁵⁵（根深蒂固的貧窮對峙：中國政府政策與項目的缺陷）中，提到中國政府明確認知到必須對抗農村地區的貧窮問題，而中央政府也很努力防止地方貪腐等，中國學者提出類似的觀察且為安戈所注意。由此可知，安戈在政府與農村政策中批評的，主要是傳統上菁英及基層人民權力不對等的關係。由於精英對基層人民的不夠尊重，缺乏傾聽，才會導致農民總是必須承受政策中有所缺失的苦果。此外，高層的政治精英之間的矛盾鬥爭所導致的施政問題，也牽連造成基層民眾生活的痛苦不安。

在對農村未來的展望和觀察等研究中，安戈的關注焦點為農村在中國社會、經濟快速轉型的過程裡，是否有受到照顧與關注。安戈認為在整個轉型過程中，農村的處境仍時常處於弱勢，其利益時常被犧牲或忽略。農村在七零年代後期開始逐漸走向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然而不論是面對資本主義或是新的社經體系中，農村往往都是一個相對附屬的角色。安戈認為，政府應該要負起照顧農民的責任。由此觀之，似乎安戈雖然批評這種精英與弱勢農民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但卻不是一種要以西方價值觀念的方式來取代或批判。相對的，安戈之批判反而較像是在同意中國傳統即精英必須負起照顧百姓之責，據此批判執政精英的作為不夠重視基層民眾的聲音。安戈對中國農村已然萌生情感聯結，在《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中末段部份談到陳村的工業化有這麼一段論述：

「雖然香港的腹地廣大周圍諸縣鄉鎮遲早會全面都市化，但就眼前一連十幾哩地，先前還是富庶的農田，如今成了坑洞土礫交雜的空地空放在那裡，畢竟浪費可惜。」

試圖了解關懷農民的處境及困難，並對於改善作出貢獻，可說是安戈整個中國農村研究的主軸，實為一種以人為本的問題意識。在安戈筆下的中國農民有著柔韌堅忍的形象，胼手胝足辛苦而努力的在中國土地上生活著。安戈農村研究所

⁵⁵ Jonathan Unger. 2003. “Entrenching Poverty: The Drawback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Programs.” *Development Bulletin*. (61):29-33.

透露最重要的事，是幫助改善農民遭遇的困難與問題。

第四節 安戈的中國轉型研究

中國近年快速的轉型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樣貌，在近年受到各界關切，安戈也參與了有關辯論。在安戈的中國轉型研究中，主要還是以他對實際情況的訪談觀察作為依據，在這個基礎上才更進一步的與理論對話，並對研究議題作整體性與模式性的分析。




從農村研究及社會觀察開始，安戈在八零年代的研究正在整理社經結構運作的變化，其中也涉及一些政治意義的研究。安戈在這段期間觀察中國農村發生的私有化與去集體化的政策，包括對執行實際效果的報告，並認為這是中國農村在八零年代所發生最大的轉變。在檢視這些轉變的過程中，安戈除了進行客觀的記錄外，不忘關注弱勢者。有些貧困的弱勢者在轉型過程中，反而失去集體制的照顧機能，又無力取得新的資源。他點出經濟自由化、私有化並不如一些西方學者樂觀相信的全然美好，這裡確可感受他的左派傾向。除了農民之外，安戈也和陳佩華一同注意到基層勞工的生活問題，將研究對象擴及公司企業，並從中了解轉型情況。安戈在這類研究中對於中國政府的批評，是基於實際政策施行情況的了解，就政策執行上的某些問題提出分析。這種批評不是基於某某理論信念，而是針對基層民眾受到的實質影響，及對政策施行的瑕疵，不但批評並不嚴厲，其中也讚許執政菁英改善人民生活之努力，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協助指出政策問題之所在。此外，至於安戈對於中國轉型的個人偏好與立場，可透過 1987 年的一

篇關於中國行政系統的文章⁵⁶捉摸，安戈同情中國國內主張行政透明的自由派，並在文章的最末說：

「對我們這些所有共同關切中國政治自由的人來說，未來看起來似乎沒有給予太多的保證。」

安戈表達了對中國政治能否更加自由的關切，但也提出短期內中國並不會有太大政治改變的預測，因而有異於許多認為中國會因經濟發展而發生民主化的西方學者。安戈雖然同意中國應該有更多的政治自由與開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安戈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幾乎從來沒有具體提到中國應該「民主化」。這就使得他對中國政治轉型的態度值得進一步討論，可以先從引起西方學界極大關注的天安門事件及安戈的觀察，來一窺更多安戈的政治態度。



七零年代末期中國開始進入了所謂「改革開放」時期，在經濟上走向市場經濟與務實開放等道路，同時在社會結構開始改變。在這一階段，外國學者逐漸獲准進入中國進行非官方的參訪及田野調查等工作。目睹了中國在八零年代快速的經濟發展及社會變動，引起許多西方學者關切的是，中國在政治上是否也能民主化，甚至投向自由主義陣營的懷抱。然而就在以美國為首對中國走向新興民主國家的樂觀氛圍中，爆發了在 1989 年令世界為之震撼的天安門事件。對於許多自由派、左派的西方學者而言，這個執政當局武裝鎮壓民眾示威的行動，無疑是對他們想像期待的中國一次重大的打擊，甚至有遭到背叛的感覺。在此之後美國的中國研究情勢有了很大的變化，而讓過去研究遭到嚴重挫敗的天安門事件，也因此成為西方學者極為重視的一件研究議題。

安戈在天安門事件後主持了一個中國各省在天安門事件中情況的研究，並編為書籍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中國的

⁵⁶ Jonathan Unger. 1987. "The Struggle to Dictate China's Administration: The Conflict of Branches vs Areas vs Refor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8):15-45.

前民主示威：各省報告）出版。本書各篇章主要採用參與觀察及訪談分析法，由於許多作者在天安門事件期間居留於大陸，所以能實地參與觀察各省在事件間的情況。安戈在這本書中指出，整個抗議運動事實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聲明或訴求，例如領導的知識份子要求經濟轉型加速，而工人卻發現某些經濟轉型的訴求會實質上不利於他們。高知識分子和勞工等階級之間存在鴻溝，受高教育的人並不重視其他人，反而會鄙視其它被認為是知識水準較低的階級與團體。這些多樣模糊的訴求，被簡化歸納為「民主」一詞；然而受訪者在被問及對民主的認識時幾乎都不是西方所以為的一人一票之選舉民主。各種訴求內容及證據顯示，知識份子要的並不是把政治的決定權下放給農民，而是要求必須要有監督政治系統的力量。但安戈歸結大多數的示威者的確想要更多的自由，過去，共產黨決定了一切生活的照顧及懲罰，人們的生活被官僚所控制，現在他們想要擺脫那些控制。人們要的是類似西方「公民社會」不被國家所控制的社會組織，而非「民主」。他們要的是政治的空間，要求政府能放鬆控制，讓共產黨的威權管制減少。抗議在後期出現以「市民」一詞作為抗議者身份的精神號召，安戈認為該詞的使用近於西方「公民」一詞的意涵。但此一意識仍是一個初步未經琢磨的概念，分散的團體組織主要仍是以一種情緒性的反抗，對政府表達官僚貪腐、經濟蕭條以及政黨對生活管制太多的不滿。天安門運動中人民的訴求，主要是政治放鬆、更大的自治權及個人空間。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人真正對何謂較好的政治體制及實質的訴求內容有明確的想法，可說是一個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抗議運動。因此即使這個概念的出現是朝向平民參與政治重大的一步，但如果中國要達到成為一個穩定的非威權體制國家，還有很長且需要更多重大改革的步伐要走。

可以看到，安戈一方面支持且期待中國的政治能走向更自由開放，但另一方面又澄清中國的自由派運動和許多西方人所以為的不一樣。不管在這篇研究或是其它文章中，安戈並非明確的說出希望中國要「民主化」這樣的詞彙，反而對中國將「民主化」這樣的樂觀推斷予以否證。安戈對天安門事件的研究反應，似乎

並不若其它西方同僚般的震驚，反映出他過去不預期中國政治將自由化的觀點。至於安戈明確表達的中國應有更多的自由、開放，是和他所觀察到中國人民之願望相同。從現有世界分類來看，安戈所偏好的政治制度確實較接近「民主制」的模式，但從他極力避免使用中國應「民主」的敘事風格，安戈是有意識的要與民主理論的支持者作出區別。用意可能在於避免遭人誤會，以為他支持西方民主理論中特定內涵的民主體制。

安戈針對中國轉型的整體性、系統性的研究，主要是從 1994 年的“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中國，統合主義與東亞模式）這篇和陳佩華共同發表的研究開始的。該篇研究以對中國的企業、自治組織團體、各種協會的觀察為基礎，研究這些民間社會團體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模式，推論國家社會運作型態的走向。該篇文章有多次更新版本，並有針對相關主題的系列研究，針對這個主題至 2009 年最新的作品是 2008 編著的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社會組織與中國官方：競逐的空間）這本編著。這系列研究的另一層對話意義是，究竟中國的民間社會是否形成擁有自主力量的「公民社會」，因而便合於一些西方學者所期盼的民主推論。安戈與陳佩華認為，過去幾十年學者慣用國家－社會－經濟的社會科學概念，已經很難再適用於九零年代的中國。但有一個既存的概念是較接近且有助於了解中國當時的國家社會運作方式，即「統合主義」（corporatism）⁵⁷。

在安戈的研究觀察中，「統合主義」儼然是轉型中的中國最常出現的政經、社會運作模式，統合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組織及政府間需要共識與協調，決定的政策須政府及社團配合執行。安戈認為統合主義是一種在威權或民主國家中都

⁵⁷ Corporatism被譯為「統合主義」或「組合主義」，這是一種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的運作模式。在這種型態的國家運作中，社會的各個領域被組織成數個代表團體，代表參與該團體成員的利益。而政府透過與各領域代表組織團體的諮詢協調，做出決策並請組織配合執行。但統合主義仍有各種不同的樣貌，主要以政府的主導力量之強弱來區分，依狀況不同政府和組織間會建立起不同的夥伴關係。

可能出現的運作模式，然而過去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只將這個統合主義使用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脈絡下。在日本、澳洲、英國傾向於社團須更對所屬成員負責的自由式或社會統合主義；而在威權或稱國家統合主義的國家運作中，決策由政府擁有主導力量，並對社會組織有控制的能力。安戈認為，當代中國使用統合主義的背景，出自強大的黨政官員組成之網絡，是為實現經濟進步與統治穩固的目標應運而生。然而這種統合主義在中國的發生，事實上是相當自然的，它走上的是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模式。統合主義在東亞相繼被日本、韓國、台灣所使用，高速發展與外在威脅並有的時期建立了強力的威權式統合主義。

安戈認為統合主義在東亞有兩個有利的條件，第一是各國在施行時都已建立完善強力的組織官僚體系，第二是影響東亞深遠的儒家集體精神及家父長主義。在 1994 年的研究中，安戈及陳佩華認為中國在當時便是走在國家統合主義或者又被稱為新威權主義的道路上，雖然有越來越多社會組織中的菁英追求更大的自主空間，但這種要求是希望能朝向社會統合主義轉化，而非要求民主。安戈在這些研究中仍未正面提倡或批評中國應走向「民主」，並認為只要中國在政治上持續放鬆，轉型為社會統合主義的機會將更大於民主體制的引進。但安戈也特別呼籲應該注意到，這個統合主義形成過程常忽略納入農民和民工等弱勢族群，並分析讓國家中為數甚多的人口能夠有利益表達的通暢管道，將是中國目前政治轉型成敗的關鍵。照顧弱勢仍是安戈所最重視的期待，對於中國轉型發展的觀察則在分析之餘，且並不對這種發展趨勢作價值性的批評。

在安戈分析的過程中，儒家文化被視為影響東亞與中國最深遠的文化基底，但他並非從事專門思想的研究，他對儒家的認識，是來自其他思想研究學者的論文閱讀以及自身的中國經驗，並接受當代西方哲思對儒家的理解方式。這種理解包括將儒家文化解釋為重視群體利益大於個人的集體主義、家父長主義式的精英照顧、管理一般民眾以及重視家庭、倫理的組織方式等。在安戈對中國的實際觀

察中對這些詮釋並未辯駁，而是引用在自己的研究裡，在價值態度上也並未給予明顯的評斷。但安戈並非將「傳統」的實然視為全盤接受的應然存在，例如在陳村研究中提到官場中腐敗金錢交流的傳統，他就將之與來自香港較佳的開放化、明朗化的經濟運作觀點對比。

雖然就安戈研究中透露的有限訊息很難明確釐清安戈的價值觀，而安戈也一直在避免作出過度明確的價值性論述，但仍可約略看到安戈對中國轉型態度的輪廓。安戈正面表達的轉型期望是政治空間的放鬆，朝向一個更自由開放的方向走，然而卻並非是某種明確的形式制度。對於中國轉型中的趨勢和路線，安戈並未持一種根本價值信念上的批評，在態度上可說是尊重但關切。這種關切來自於他對弱勢者一貫的關懷，在轉型中這些弱勢者是否被關注以及生活處境是否有受到較好的照顧，是他最關心的問題。同時，由於注意到當一般社會大眾面對政府、黨政菁英時，是處於一種弱勢的角色，故主張中國應該在政治上能更加放鬆，給予個人更多自由的生活空間，這不僅是安戈所觀察到中國民眾的渴望，也是安戈自己的期待。雖然在安戈的研究中所透露的訊息，很容易讓人聯結到他對民主有所偏好，例如在他對國營公司內部實行草根民主的研究中，分析了各種由於參與者觀念上的問題所導致的效果不彰，但安戈為了避免從一種具價值優越性、理論性的普世民主制度來要求中國民主化，因此會避免明確使用這類字句。由此可見，安戈對於生活在當地的人們價值之選擇，盡量的希望能做到持有尊重的態度。而他所做的批評及問題，主要也是針對政策目的與實際執行中出現的落差，旨在能夠對實質問題的改善提出貢獻。自由開放是安戈自身的價值偏好，而由於更多的自治與生活空間也是安戈觀察到人民自己的期待，因此這便是他願意明確正面表達的期望和批評依據，可見一種價值的落實，要靠對當地人們想法的了解為前提，並以為基層、弱勢民眾發聲為方法。

第五節 個人、環境、反應—安戈與其中國敘事綜合分析

整體言之可以看到，對弱勢者的關懷是安戈在研究中顯露出一貫情感。安戈的研究以溫和而同情的筆調描繪出在中國大地上生活的人們的真實樣貌，並以此為依據進一步與學術理論對話。他參與新左派運動與這種研究關懷有無因果關係，外人雖無從得知，但可推測這種經驗或許有助於形成對弱勢的關懷。但安戈在後來似乎又與一些左派學者有所歧異，可以從安戈對天安門事件關切但非震驚的態度反應為例，這應與他自 70 年代起長期實際與中國接觸了解有關，也許安戈對於左派理想下的中國的想像，早在 1971 年第一次踏上中國的震撼中就動搖了。安戈對中國的認識，重新建立在與人們的實際互動、經驗、聽聞之中，在這個過程裡有一個人應該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有著華人背景的博士配偶陳佩華。

陳佩華 對安戈而言不僅是一個認識中國的對象，在往後的日子中更是一起去認識中國的夥伴。但陳佩華對中國的情感是相當微妙的，如本章第一節所提及，陳佩華在接受訪談時表示還是希望能為自己的同胞做一些幫助，但另外又對當代中國的環境、氛圍、黨政社會關係問題表示反感。香港的意識形態及教育思維和當時的中國大陸有著很大的差異，有著西化的思維，陳佩華在接受訪談時也表示自己的思考是西方式的。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安戈和陳佩華一起去認識中國。

他們在研究議題上時常辯論，但對弱勢者的關懷是他們共有的態度。例如在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中國勞工在全球化經濟下的被壓榨）裡，陳佩華就 23 個在中國勞動基層發生的案例，以報章記錄及訪談經驗的分析，揭露中國勞工悲慘的實況。無論是在本地或是外國公司的工廠裡，基層勞工都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下被聯合壓榨的對象。在 “Culture of Survival: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the Prism of Private

Letters”（生存的文化：通過私人信件透視外來工人的生活）⁵⁸中，則透過一間中國工廠大火後罹難者所遺留下來的書信以及與倖存者的訪談，沉痛表達了基層勞工為求生存，不得不投入條件惡劣的工作環境之無奈。同時，在陳佩華的研究中有著更明確的左派論述，例如在〈全球化、社會條款與中國工人〉⁵⁹中，論述國際勞工為爭取權利奮鬥的歷史，談到在全球化經濟裡發展中國家壓低勞力成本的惡性競爭造成勞工更加被壓榨，最後更提出國際勞工團結一致的期望。也在“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Workers' Conditions: Comparing Taiwanese Factories in China and Vietnam”（台商、國家機關與全球反血汗工廠運動：中國與越南比較）中⁶⁰，以在中國和越南基層的田野調查及報章資料，批判中國對國內勞工的保護及人權意識不足，並提出向國家施壓的運動方向。

從文字的使用上來看，陳佩華批判性的力道似乎比安戈更強，無論是對中國政府或是想辯論的其它對象。相對於陳佩華的強力批判，安戈似乎在理解問題的態度上稍微溫和一些，認為有些問題中國的當政者確有難處。但無論如何，和陳佩華長期且緊密的關係讓安戈能更體會一種華人對中國問題思考的敏感性，且在議題關切上讓安戈一起注意到中國基層勞工問題。他們有著多篇聯名發表的著作，例如之前曾提到討論中國統合主義組織結構的“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中國，統合主義與東亞模式），以及如中國勞工研究的“Blood, Tears, Toys, and NGOs”（血，淚水，玩具及國際非營利組織）⁶¹等等。在“Blood, Tears, Toys, and NGOs”提出中國勞工受到西方跨國企業、中盤商及政府的聯合剝削，西方媒體不應只將問題指向中國當局，另外也談到國際非營利組織及公民

⁵⁸ Anita Chan. 2002. “Culture of Survival: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the Prism of Private Letters.” In *Popular China*, eds.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Pickowicz. Boulder: Rowman & Littlefield, 163-188.

⁵⁹ 陳佩華，2001，〈全球化、社會條款與中國工人〉，常凱、喬建（編），《WTO：勞工權益保障》，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頁 270-287。

⁶⁰ Anita Chan & Wang Hongzen. 2004.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Workers' Conditions: Comparing Taiwanese Factories in China and Vietnam.” *Pacific Affairs*. 77(4): 629-646.

⁶¹ Anita Chan and Jonathan Unger. “Blood, Tears, Toys, and NGOs.” *Yale Global*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0094.\(09/0709\)](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0094.(09/0709))

運動的努力。這些聯名的文章也就代表著他們在中國社會組織及基層觀察等問題上，達成了一定的共識。訪談中安戈和陳佩華也表示，她們會閱讀彼此的文章並加以討論。在被問及身份問題時，兩人皆認為自己沒有很強的國家認同身份。安戈與陳佩華兩人在成年後，便很少待在自己出生地，長年旅居各個不同的國家。安戈覺得自己的身份是國際性、世界性的，由於長年在各國旅居的經驗，因此他沒有依國家疆界形成認同，而期待自己能客觀的觀察每個國家。兩人由於最終定居澳洲多年，因此也會關心澳洲當地新聞、事件，以及稍加注意美國及香港的資訊。但總體言之，兩人在身份問題上有相同的認知，且身份問題並未特別造成困擾，這也暗示「澳洲」環境對身份問題的影響不大。

不過從安戈的許多文字內容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安戈和中國、中國農村確實建立起了某種情感上的連繫。而他也有意識的想為被他視為朋友的人們做出一些幫助，透過議題辯論的參與、文章翻譯、政策問題的分析，親身參與在中國轉型的過程中。這樣的情況，或許可以稱為是普遍人性的關懷和對中國特殊情感的結合。

那麼，澳洲在安戈的中國研究裡的究竟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呢？閱讀至此可以發現，澳洲在他的研究主題裡並不占有重要的位子，甚至可以說極少出現。在安戈的文章裡找不到類似像「澳洲意識」這樣的東西，也看不到有「澳洲」因素介入影響的痕跡。而從安戈在澳洲的學術生涯境遇的穩定單純來看，安戈並沒有因「澳洲」而須特別去做甚麼改變，僅依自己的需要及興趣去研究即可。似乎澳洲對他研究的意義而言，是提供了一個舒適的研究和生活環境，讓他可以自在的於此從事自己喜歡的研究。而學術社群成員多元的背景，也讓從外而來的研究者較不會有無法融入的憂慮。以安戈所在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為例，該中心幾乎所有的成員都是來自世界各不同地方。而在與安戈的訪談中他也表示，在澳洲由於學術發表等相關規定較少，從事研究時也因此感覺到較自由，對於所身處的澳大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這個環境極為滿意。

而安戈、陳佩華，以及其他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僚是否又能對澳洲的學術研究能產生影響呢？我們可以從*The China Journal*期刊改名的這件事略窺一二。該刊原名為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雖然正式改名為 *The China Journal* 是 1995 年的事情，然而其實安戈與陳佩華及其他同僚已經在更早以前就開始推動這個改名的計畫了。延宕數年的原因正是因為這個改名的動作遭到了部分來自當地學者的反對和抗議，在他們的意見觀感中，這似乎是有一些外人來到了澳洲並且把「澳洲」從原本屬於當地的這本刊物中拿走。而這個改名也的確是有它的實質意義的，是在屬性路線上的實際改變，要讓這本刊物成為一本國際性、世界性的期刊。*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的正式更名是在第 34 期之後，以*The China Journal*為名發行。觀察歷年刊登在該雜誌上的文章，以所屬的主題類別在各期刊登的分佈來看⁶²，可以發現在歷年期刊中所登主題中，聚焦在澳洲與中國關係的共有 24 篇論文，算是數量相當多的一個主題，但 24 篇文章刊登的期數都在 34 期以前。似乎在安戈、陳佩華等接手編輯之後，「澳洲」的屬性就已淡出該期刊，而試圖讓這本期刊能成為國際讀者所共享的刊物。安戈曾談到在一開始經營這本刊物時最困難的問題，是很難收到來自澳洲以外的稿件。他解決的方法是將編輯群真正的國際化，讓編輯群中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成員。

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原先來自澳洲之外的學者，由於與澳洲的連結較弱，反而因此能在某些事情上將視野打開，執行走向世界的「去澳洲化」。可以說是澳洲提供了資源和空間，讓原先來自外地的研究者能在此較自在的發展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路線辯論的過程中，這些原先來自外地的學者居然

⁶² 資料來源為China Journal網站，查閱日期為 2009 年 6 月 23 日。
<http://rspas.anu.edu.au/ccc/tcjtopic.htm>

可以在這個事件中最後取得主導地位，可見他們是可以在當地的學術社群裡生根成地位平等的一員的。而China Journal也在安戈等人選擇國際化路線的努力下，成爲一本在世界上極爲重要的中國研究期刊。然而今天我們在討論這本期刊時，仍會記得這是一本來自澳洲所發行的期刊，對澳洲學術研究聲望與形象有著極大的幫助。

最後，安戈以基層作爲研究課題，重視農民與其他弱勢者、主體性的研究旨趣，與當代澳洲中國研究流行的問題意識有高度的一致性。基層的主體性或不居於國家機關主導的行動者，是澳洲中國學界近來共同的關切。不論這個主體是農村、工人、民族、縣、省等等，發掘外於國家的基層主體已經是澳洲中國學界的重要特色。故即使安戈沒有觸及澳洲，但他這種非理論導向的基層田野研究，並沒有擺脫澳洲中國研究的趨勢，這點將在第四章中另予討論。



第三章 何包鋼及其中國敘事

第一節 何包鋼的個人背景及研究經歷

何包鋼教授出生於 1957 年，故鄉為中國內蒙古的包頭市。大學就讀杭州大學哲學系，1986 年在人民大學取得哲學碩士的學位。1987 年何包鋼以訪問學者身份先到澳洲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追隨邱垂亮⁶³教授作研究，1988 年底再到澳洲國立大學，1989 年中研究交流天安門事件爆發，導致何包鋼返回中國的行程延遲，並作出留在澳洲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決定。俟 1993 年完成博士學位，何包鋼便進入澳洲塔斯瑪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⁶⁴擔任政府學系講師，期間曾有一段時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擔任高級研究員（2001～2004），直到 2005 年轉任澳洲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⁶⁵國際關係學系講座教授至今，並曾歷任系主任及政府學院副院長等行政職位。

年輕時的何包鋼主攻哲學，這成為他日後從事思想性研究的基礎。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新的風氣，當代西方的各種新潮思想被大量引進，並在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間引發熱烈廣泛的討論。對中國未來懷抱著理想與熱誠的何包鋼，就是在這種背景的薰陶下接觸到了當代自由主義的思想，並深深為之著迷。1986 年底，何包鋼與何懷宏⁶⁶、廖申白⁶⁷共同著手翻譯當代自由

⁶³ 邱垂亮，台灣人，1938 年生。大學就讀台大外文系，1971 年取得加州大學河邊分校(Riverside) 博士學位後至澳洲昆士蘭大學任職，往後在澳洲取得卓越成就。曾獲澳洲政府頒發「澳洲建國百年特殊貢獻勳章」，表彰他的學術成就及對促進台澳關係的貢獻。除了學術活動外，亦長期關注參與政治活動。

⁶⁴ 塔斯瑪尼亞位於澳洲南方，是澳洲六州中最小的一區。塔斯瑪尼亞大學是澳洲第四所成立的大學（1890 年），除了在澳洲歷史悠久外在教學研究等綜合表現上也有相當好的成績及聲譽。

⁶⁵ 迪肯大學位於澳洲維多利亞州，是一所公立大學，與澳洲工商界、政府及社會的合作相當密切。

⁶⁶ 何懷宏，1954 年生，中國江西省清江縣人。專業領域為哲學研究，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主義思想巨作：羅爾斯（John Rawls）⁶⁸的*A Theory of Justice*（正義論）。翻譯《正義論》的經驗對何包鋼來說有著重大的意義，他這麼形容從事這個翻譯工作的心情：

「在當時的背景下，這個翻譯工作給我們帶來了一種無限的快樂和欣慰。我們好像是突然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可以逍遙自在的世界，一個理想的、自由的世界。羅爾斯的《正義論》勾畫了一個非常理想的自由世界，這個世界是如此的井然有序，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每一個成員都享有平等自由的機會。」

在往後的日子裡，何包鋼反覆思辨《正義論》中所討論的各種問題，並且從完全的認同吸引，到後來反思批評。

天安門事件的爆發是影響何包鋼一生的轉捩點，當時何包鋼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澳洲國立大學研修，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何包鋼的訪問學程已即將結束。自4月起在中國發生的示威運動引起各界重視，最後爆發了武力鎮壓示威運動的天安門事件。得知這個結局，何包鋼受到極大震撼，隨之而來的則是巨大的失望。事件令他沉澱，並且在幾經思考後作出暫緩返國，留在澳洲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重大決定。

事實上，何包鋼日後在隻身在外的感覺是孤獨的，但在知識的精神生活中卻是快樂的，何包鋼在回憶⁶⁹中寫到：

「當時我獨自一人在坎培拉讀博士，很孤獨，有很多閒餘時間閱讀各類學科的書籍，諸如天文學、地理學、歷史學、哲學、心理學、教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遨遊於知識的海洋，漂泊於各學科的“闖江湖”般的快感，是我終身難忘的愉快經歷，一種精神的快樂。」

⁶⁷ 廖申白，1950年生，中國江西省高安縣人。專業領域為倫理學研究，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⁶⁸ John Rawls（1921~2002），美國人，他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及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所著《正義論》讓政治哲學再次成為學界中爭論的焦點。

⁶⁹ 參見何包鋼，2009，〈正義：烏有之情與現實之域〉，《中國社會科學院報》，（38）。

何包鋼在澳洲學界一直沒有和太多人交往，但他的學術生涯大致上仍是順利的，且有著頗為豐富的經歷。除了 1993 年畢業後進入塔斯瑪尼亞大學任教，及 2005 年後轉赴澳洲迪肯大學任教外，期間還有多次得以訪問學者身份造訪其他國家。何包鋼教授談到⁷⁰，他在澳洲多數時候可說是一個受益者。即使語言表達在最初確實造成一些問題，但檢視何包鋼的經歷，確能憑藉研究成果爭取到許多學術上資源。何包鋼教授認為他在澳洲有公平的機會，包括早年應徵教職在內：當年的他並未成名，也無強有力的關係背景，而與他同時應徵的其中一位卻是曾擔任學院院長職的學者，在學界也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後來該校仍認為何包鋼的研究較有潛力，因而錄取了他。這未必是制度設計有利於公平競爭，起碼何包鋼所體會的是一種融入在澳洲文化中的風氣，甚至可說是一種寶貴的文化資產。



何包鋼的研究主題相當廣泛，但最主要是圍繞著民主理論及中國問題。由於在學術上的優異表現，何包鋼聲名日榮。1994 年時即以“Dual Roles of Semi-Civil Society in Chinese Democracy”（準公民社會在中國民主化中的雙重角色）一文獲澳大利亞政治科學期刊（*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評為最佳論文。往後他多次獲得研究計畫贊助，並常接受電台媒體專訪，以中國專家的身份活躍於西方媒體。除了在澳大利亞當地的成就外，何包鋼的名聲也延伸到海外，經常接受各國媒體訪談，並曾應聯合國與中國民政部邀請於 2001 年至中國評審聯合國資助的中國鄉村民主事宜。


在田野調查研究的需要及對中國民主發展的持續關注下，何包鋼從九零年代末期開始回到中國進行基層民主的研究，主要合作的對象是與他頗有淵源的浙江大學⁷¹及華中師範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2004 年由何包鋼作為主要召集人在浙

⁷⁰ 2009 年 4 月 27 日筆者及研究團隊成員與何包鋼教授在澳洲迪肯大學作過一次訪談。

⁷¹ 何包鋼大學時期就讀杭州大學，1998 年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

江大學舉辦的「協商民主理論與中國地方民主」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是象徵何包鋼在思想上的一个轉折點。原本一直懷抱著對自由主義堅定信念的何包鋼，在中國發現農村民主的種種現象，以及期間實踐協商民主理論的可能性後，開始對過去所懷抱的自由主義信念產生反思，進而有了召集這次國際學術會議的想法。會議的過程是順利的，何包鋼也正式開始把注意力放在推動中國的協商民主上。這次會議代表著何包鋼對未來的願景走向一個更開放、更多元的型態。

何包鋼因意外而留居澳洲發展，雖在當地交往不多，卻仍能先在澳洲取得成功，進而在整個西方學術體系內有所成就。何包鋼作為一個懷抱理想及熱情的知識份子，雖然身處外地，但心繫中國，對中國未來的關注是他一生的事業。雖然有人認為何包鋼身處在中國之外，但何包鋼認為自己是從不同的位置推動對中國未來的理想，期間的使命感，與在國內的知識份子並無二致。



第二節 何包鋼的思考架構及研究特色

第一項 研究方法特色

何包鋼研究方法的使用相當多元，並不偏採某種方法。由於何包鋼有早年的哲學背景以及後來在澳大接受的實證訓練，因此他的研究主題兼顧政治思想性與實證性，甚至能將這兩個差異甚大的領域結合。由於早年何包鋼在哲學領域中的修習主要是認識論，和德國唯心主義有密切關係，曾發表這方面的探討，但還是透過翻譯羅爾斯的《正義論》讓他深刻的進入了西方政治哲學的領域。由於《正義論》中廣泛涉及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爭論，在往後研究中有關的思想、策略與主題選擇，往往都可溯及羅爾斯。

整併為浙江大學，因此何包鋼算是現在浙江大學的校友。

觀察何包鋼的研究，可知政治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基礎，他的實證經驗研究皆有思想理論為本，並藉由實證研究來驗證理論。例如他在浙江從事的一系列農村選舉情況的調查，皆根據先前曾發表的民主理論設計研究問題。而透過實證主義來發現普世性科學法則，則是何包鋼從事學術研究的重要目的。其認為來自西方特殊性脈絡的理論思想，透過哲學的思辨後可以上升到普世性的層次。然而若想要驗證這些理論在西方以外的適用，就必須要再放到西方之外的地方去檢驗，而檢驗的方法便是實證經驗研究。故謂何包鋼在方法論上同時重視哲學思辨和實證方法，並在使用上試圖將兩者作結合。

第二項 何包鋼的研究思考脈絡

何包鋼的研究議題，基本上都圍繞著「中國民主化」為核心。這個主題是出自於對中國未來的關切，以及與自由主義理想的結合。因此對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及民主理論的整理，是瞭解何包鋼思想所必為。這類研究在中文作品的部分包括有對羅爾斯自由主義思想研析的 1988 年〈羅爾斯的政治自由的概念：兼論大陸與台灣的政治自由〉⁷²及 1990 年的〈民主的烏托邦：Barry Hindess 的民主思想〉⁷³等。英文作品則有如 1995 年“Desig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Evil”（民主制度設計中的罪惡問題）⁷⁴、2004 年的“Confucianism versus Liberalism over Minority Rights: A Critical Responses to Will Kymlicka”（儒家思想和自由主義對少數民族公民權：對威爾·金姆立克的評論性回應）⁷⁵等等。

⁷² 何包鋼，1988，〈羅爾斯的政治自由的概念：兼論大陸與台灣的政治自由〉，《中國論壇》，（321）：71-80。

⁷³ 何包鋼，1990，〈民主的烏托邦：Barry Hindess 的民主思想〉，《中國論壇》，（361）：48-53。

⁷⁴ Baogang He. 1995. “Desig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2(2) 292-321.

⁷⁵ Baogang He. 2004. “Confucianism versus Liberalism over Minority Rights: A Critical Responses to Will Kymlicka.”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1(1):103-123.

第二類的研究主題直接涉及在中國現況脈絡下的民主理論，直接針對中國民主化的各種問題，這是何包鋼最早爲人所知的專長領域。由於中國的民主化是他最期待的目標，因此這些涉及中國的民主理論與實踐的論文佔了最多。這類的研究有的是針對理論或模型放在在中國現況的討論與分析，例如 1994 年的“中國民主化之路：兩個步驟與政治的妥協”⁷⁶、同年在澳洲發表並獲獎的“Dual Roles of Semi-Civil Society in Chinese Democracy”（中國民主化中半市民社會的雙重角色）⁷⁷、1996 年的專書 *The Democratisation of China*（中國的民主化）⁷⁸、1997 年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中國市民社會的民主意義）⁷⁹ 等。而更強調實證經驗研究與理論結合的主題，則主要集中在中國的農村民主研究，這是由於何包鋼和許多學者同樣認爲中國的民主化是從農村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將民主視爲一種新的治理方式，在八零年代起開始試行在農村建立村民委員會的農村民主。何包鋼針對農村民主與和自己頗有淵源的浙江大學合作，長期進行農村民主的實證經驗性研究。這些作品例如有 2002 年的專書《尋找民主與權威之間的平衡：浙江村民選舉之經驗研究》⁸⁰ 以及 2007 年的專書 *Rural Democracy in China*（中國的農村民主）⁸¹ 等等。

另外還有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的研究，這些思想被何包鋼視爲是中國文化的固有政治、社會思考。這些傳統思想與民主理論、自由主義的適宜性之間如何調適，使民主理論制度得以在中國順利發展，是研究的目的。在這些研究中，何包鋼討論傳統文化與思想中有利與不利民主的因素，並提出補充改造的建議。這

⁷⁶ 何包鋼，1994，“中國民主化之路：兩個步驟與政治的妥協”，《中國知識份子》，(3)：14-16。

⁷⁷ Baogang He. 1994. “Dual Roles of Semi-Civil Society in Chinese Democr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1): 154-171.

⁷⁸ Baogang He. 1996. *The Democratisation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⁷⁹ Baogang He. 1997.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⁸⁰ 何包鋼、郎友興，2002，《尋找民主與權威的平衡：浙江村民選舉之經驗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

⁸¹ Baogang He. 2007. *Rural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類研究有早年的〈中國集權主義的情感上的根源〉、〈民主化和中國權力觀的變化〉，以及 2000 年 “New Mor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Design”（中國民主制度設計的新道德基礎）⁸²、2004 年 “Confucianism versus Liberalism over Minority Rights: A Critical Responses to Will Kymlicka”（儒家思想和自由主義對少數民族公民權:對威爾.金姆立克的評論性回應）等。

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也是何包鋼研究的中另一項重要課題。何包鋼對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也是放在中國民主化的大框架下，他認為中國若要成爲一個民主國家，則處理好國內的各族群問題是追求穩定的關鍵。另一方面，中國的民族主義倘若走向激烈因此作爲犧牲少數族群，則是中國走向民主的重大阻礙。因此如何化解族群衝突，並避免民族主義成爲中國進步的障礙，是何包鋼在這個領域研究的重要思考。由於中國政治氛圍敏感，這類作品多由英文發表。例如有 2000 年的專書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和中國民主化）⁸³、2003 年 “Why Is Establishing Democracy So Difficult in China: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爲何在中國建立民主如此困難：來自中國認同問題的挑戰）⁸⁴等等。

最後則是何包鋼近年所關注的中國與協商民主理論的研究，這些研究對他過去曾堅定主張的自由主義以及某些西方價值觀作出反思，對於價值體系、不同的文化觀點、制度形式也開始持更開放的態度，並對於在中國可能發展出新的民主形式表達期待。對何包鋼而言，協商民主並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是在實踐他推動

⁸² Baogang He. 2000. “New Mor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China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ing the Prospect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ed. Suisheng Zhao. London : Routledge: 89-107.

⁸³ Baogang He and Yingjie Guo. 2000.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ers.

⁸⁴ Baogang He. 2003. “Why Is Establishing Democracy So Difficult in China: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Chinese Contemporary Thought* 35(1): 71-92.

中國民主化的使命感。如 2008 年的《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⁸⁵、2006 年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尋找中國協商民主）⁸⁶。

可將何包鋼的研究思考脈絡做一簡化整理。首先，「中國民主化」是他最主要的問題意識，因此研究民主理論，與在中國脈絡下的討論及實踐佔有他研究中最多部分。既然以自由民主做為理想，因此對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與思想的釐清，成為他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同時，中國的情況要加以掌握，故必須先認識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習慣等條件，並對這些固有傳統與民主理論之間的調適性做出分析和建議。另一方面，中國的族群認同問題以及民族主義必須處理好，否則可能是中國民主化最大的阻礙，因此也必須研究這些議題。何包鋼不想僅止於觀察分析，協商民主的實驗及研究就是在現實中實踐理論與理想。他做為學者且重視科學知識本身，何包鋼希望能對政治學的普世性與知識性有所貢獻，因此在研究中遵守學科專業，並希望能先在中國的脈絡中實踐，再回頭進一步發展理論。



第三節 何包鋼的中國轉型研究

在何包鋼的中國轉型研究中，目標很明確是要朝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本節主要討論的是何包鋼對中國民主化的思考，以及他對於民主願景的期待。

首先，何包鋼最初被自由民主理論所吸引的契機，是在當時中國的社會與政治背景下，閱讀到羅爾斯的《正義論》，進而從其中找到了理想與正義社會的畫像。1996 年的專書 *The Democratisation of China*（中國的民主化）即為早年代表性的著作，這本書集合了何包鋼早期對中國民主化思考的重要論文，是瞭解何包

⁸⁵ 何包鋼，2008，《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⁸⁶ Baogang He and Ethan Leib (ed). 2006.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 : Palgrave.

鋼學思的重要文本。何包鋼以兩種在年輕時影響到他的重要政治思想為本書破題。第一種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即從接觸羅爾斯後形成的政治哲學思維，由此對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的民主未來進行研究和思考；第二種是平民主義（populism）的思維，這種思維是何包鋼在青少年時期在中國所接觸的，何包鋼即長後仍記得在閱讀到平民主義思想時的興奮。中國文革期間由於官方對書籍的禁錮，出現許多的地下讀書會。例如在廣東以「李一哲」為筆名的一個廣東地下讀書會，張貼發送了許多大字報和文章批判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共產黨內權貴的腐敗專制，認為中國需要民主、需要保障人民群眾的權利。少年何包鋼便為這種理想和熱情所激盪。

這兩者間最大的差異是，前者偏向菁英式的代議民主，而後者則是強調直接民主參與、重視基層弱勢民眾。何包鋼坦言自己曾於個人信仰的選擇上，在兩者之間游移掙扎，這個游移在早期是以自由主義的勝出為結果，但仍可見掙扎的痕跡。不論在本書或其它研究著作中，都常提及平民主義在中國的出現及其內涵。總的來說，何包鋼在過去認為，平民主義式的民主思維雖然有其大眾直接參與的理想，但容易過於激進而有危險，在現實上不容易達成。因此應以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制度為主，並參酌平民主義所提到的種種顧及弱勢群眾的討論，以提醒補充自由主義的不足，並解決所衍生的問題。在後來何包鋼聚焦於協商民主時，這樣的掙扎得到了較好的調適。

根據何包鋼論述的自由主義式民主理論，自由平等是最重要的基礎價值，而天賦人權則是最高原則。這種天賦個人的自然權利是所有權利的來源依據，也是民主制度之正當性基礎，任何問題的處理必須以自然權利的保障為前提。人類的理性自利是自然的，因此在制度設計及價值考量上，要順應個人主義原則。但個人權利並非無限，必須適度限制以避免傷害他人的權利。為處理這種人性中自利傾向失控侵害別人的問題，就必須限制個人的「權力」，並讓力量互相制衡，故

程序主義的民主法治原則相當重要。

這些理解確實是很典型的自由主義式理論，但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在談到這些理論問題時會不斷的放到中國的狀況中討論，並且與中國國內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既有立場做對話。為本書寫序的學者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即特別提到，何包鋼不同於許多其它評論中國政治的人，因為他認真看待中國國內的民主化思維，整理出中國國內相關的辯論，以圖發展出最適合中國的自由民主概念。何包鋼也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在導論的地方就民主理論與中國實踐之間的聯結問題研究寫到：

「當然，對羅爾斯或白魯洵而言，並沒有需要在這個鴻溝間提出問題。這是只有對一個同時受中國和西方教育，同時從事西方規範理論及漢學研究工作並且認真的渴望中國能夠民主化的作者，填補這個鴻溝的議題才會是特別重要的。」(P5)

例如在探討自由主義理論設計時，即不斷與國內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民主化思想作比較，也以自由主義的觀點來對不足之處做出批評補充。

在本書的後段還花了許多篇幅來討論中國固有文化與傳統，作為發展民主的條件之討論。從這些內容與何包鋼其它討論到中國固有傳統及思想的文章，或可一窺何包鋼對「傳統」的態度。何包鋼在這裡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民主有利和不利的要素。在正面有利民主的部分，他認為中國文化中有許多可發揮類似西方文化的功能性價值，且文化是可以塑造培養的。何包鋼認為中國追求民主最大的問題是文化轉型期的不穩固，以及包括對集中制的偏好、沒有穩固的公開妥協習慣、列寧式共產文化的影響等，其中引用不少西方學者觀點。由以上可知，早期的何包鋼在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上，似乎較傾向去思考如何改造使其適合民主，民主理論居於指導性地位的比重較大。在被認為是中國固有政治思想的儒家研究方面，何包鋼也整理了過去學者對儒家文化與民主的正負面影響之研究。他認為儒家文化仍提供了一個發展民主的文化基底，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台灣、韓國

皆發展出民主。何包鋼進一步論述儒家文化在政治關係中所強調的價值為「責任」，且推崇公利，人們應依所屬身份來互動以共同建造社會秩序。他認為這樣的方式是不足的，因為這樣仍無法對個人做出基本的保障而可能造成侵害。應將「權利」的概念融合進政治價值思考，以此作為政治關係與問題解決的方針，創造一個新的文化道德基礎以利發展民主。

天安門事件作為影響何包鋼一生的轉捩點，自然也為他所重視研究。對天安門事件的研究，主要是在市民社會討論的框架下。何包鋼在這些研究論文中基本上同意在中國的自治組織可說是「半市民社會」，而在天安門事件中不成熟的組織運動也可能反過來傷害了民主。市民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面擁有相對自主權的半市民社會可形成對政府的壓力，但另一方面保守的組織則可能被威權政府所利用支持新威權主義，而過於激進的市民社會更不利民主進程。但和其它學者不同的是，他主張在中國的這些半自治的組織亦可能為改革者所用，看到較積極有利民主的面向。

2004 年召開協商民主研討會後，何包鋼的研究有了相當的改變，對西方自由主義理論開始出現若干反思。事實上，在 2004 年前何包鋼對於範式思考的改變就可看出痕跡。國家認同問題一直是何包鋼研究中要處理的重要議題，何包鋼認為如果在中國試圖以民族主義來解決國家認同問題，用強硬的手段來處理少數民族以及兩岸問題，那麼只會收到更激烈反抗的負面效果，對中國的發展有著極不良的影響。何包鋼在 2000 年的著作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和中國民主化）中認為，由於民族主義在中國是以強調歷史、血緣、文化、傳統等作為強化國家認同的價值，而未包含民主原則及程序，因此容易傾向強橫激進。另外則盛讚澳洲由於有著民主傳統及價值，因此發展出自豪且不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但在 2002 年的 “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in Europe and East

Asia”（全球民主與歐洲、東亞的民族認同）中開頭段落便寫到：

「全球民主概念在東亞的應用受到數個限制因素而無法理解成普世觀念，只是局部特殊條件下的區域現象。本篇可作出東亞會找到自己的途徑來面對國家認同問題處理的結論，特別可從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的一些內容上看出來。」

在敘述這個議題的語氣上已緩和許多，並且在本篇的最後提出，以全球民主處理國家認同問題的觀念，是適用於歐洲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概念：

「全球民主在東亞的數個因素限制之展現，也表示它並非是一個普遍適用的議程，而只是適用於歐洲的局部特殊條件下的區域現象。」

之前與澳洲比較後認為西方具有優越性，中國應加以學習的主張，似已不復。在 2008 年的著作《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中，更進一步談到民族主義所代表的「歷史原則」，和用民主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民主原則」相較，是在處理國家認同問題上對立的兩個標準，故屬性上可區分成爲非民主和民主的。在實踐上他認為應該嘗試兩者兼採，畢竟民主選擇必有其歷史，用民主方法來解決國家疆界問題不能離開歷史因素的思考。民主原則不可能完全反對歷史原則，以美國憲法爲例，在早年制憲時思考所決定的原則後代不應違反，從這點來講民主自身包含了「反民主」的成分。民主自身也有歷史，用民主方法來解決國家認同問題到目前約略是兩百年的時間，相對於許多糾結深厚的長久歷史問題是較爲淺薄的，因此不可能完全僅以民主理論來解決。

介紹何包鋼後期對民主的觀點，可從 2008 年出版的《民主理論：困境與出路》來看，該書是何包鋼在經過多年的研究思考後，對民主理論和問題的整理和反思；而協商民主則是第一本標題中民主理論的「出路」，這在《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中有更精細的技術實踐及實證研究討論。在《民主理論：困境與出路》裡，何包鋼討論幾個他認爲是民主建設中的永久問題，介紹西方理論思想家對相關問題的思考，也闡述了自己的想法與中國的現況。與早期代表性的著作 *The Democratisation of China*（中國的民主化）相比，本書對自由民主理論有

了更多的反思和批評，不再只用自由主義來批判中國國內關於民主的思維，有時甚至用中國的思想觀念及實踐，批評自由民主理論。何包鋼對民主的思考走向一個更多元開放的態度，在書本的開頭即談到真正的民主不該崇尚任何絕對的真理，不能先驗的決定某種民主政治。本書除再次論述權利理論及程序主義外，更重新考慮了直接民主及大眾參與的問題，檢視西方直接民主理論者對代議民主的批評，另外藉由與對民主發展持悲觀論的欣得斯（Barry Hindess）⁸⁷對話，來反思主流民主理論。欣得斯悲觀的認為西方世界已遺忘古希臘的民主精神，所謂「民主」在今天不過是自由與個人主義而已。在現實中人們各為自己的利益來操作「民主」，並且在實踐中以菁英主義作為主流。何包鋼反問了中國的民主實踐中，直接民主是否有落實，顯然在這個曾經讓他掙扎的議題中，他重新重視直接民主的意義。



本書還有許多對羅爾斯思想的討論介紹及反思。除了仍讚賞羅爾斯式人人皆有平等自由之基本權利的理想外，也反思歷史上其它因素對社會穩定進步的貢獻，未必亞於自由主義權利觀念的貢獻。而羅爾斯的「交疊共識」以各方學說、思想中都能夠接受的社會公理作為社會整合的基礎，也提供了中國日趨多元的文化與思想整合互動之道，例如將西方民主理念與中國固有「民本」傳統結合就是類似這樣的努力。接續在後半段則介紹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⁸⁸的溝通理論以及沃爾澤（Michael Walzer）⁸⁹的多元正義觀，並和羅爾斯的觀點做比對。在哈伯瑪斯的部分較特別的是，何包鋼將梁漱溟⁹⁰和哈伯瑪斯提倡理性溝通的相似之處做討論，但批評前者在民族主義的背景下從事思辨，因而沒有嚴謹的推論又

⁸⁷ 欣得斯(1939—)現為澳洲國立大學政治系教授，英國人，他長期研究西方民主理論。過去曾對民主理論及英國議會民主未來發展充滿希望，後期則轉悲觀，對西方民主的菁英化感到失望。

⁸⁸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1929— ），德國當代著名政治思想學者，退休後仍持續從事研究。

⁸⁹ 沃爾澤（Michael Walzer，1935—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是當代重要的西方政治哲學家。

⁹⁰ 梁漱溟（西元 1893—1988 年），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長期推動文化、教育、鄉村建設。中共在中國執政後多次被點名批鬥，但仍風骨傲然，1988 年病逝於北京。

過於自信。然後，何包鋼又從韓非子⁹¹人性本惡的思想來對哈伯瑪斯做出批評，認為哈伯瑪斯對人類都具有理性可以克服自利的假設，在現實中常與經驗不符。另外，他引用沃爾澤的多元正義觀，認為每個地方有不同的對正義之思考脈絡，僅承認一種可供深化交流發展的最低道德共識，反對普世法則以一種霸權式、普遍式的批評來取代地方的、內部的思考。沃爾澤否認有一種抽象的可應用到中國的民主理論，更反對美國對民主制宗教式的崇拜傳播，另外他也曾尖銳地批評白澳政策。何包鋼認為這種討論有助於中國創造屬於自己的民主制度，而他也認為中國的鄉村民主的確創造出許多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制。

在本書中何包鋼還討論了他一直重視的國家認同與民族文化問題，以及全球普遍性與地方特殊性的關係。何包鋼闡述了關於全球正義與地方正義的關係及自己的主張。何包鋼認為，全球性正義思想其根本缺點在於對地方性正義觀的忽視，所以雖然宏偉但卻缺乏地方根基的支持。多數的全球性正義理論淪於以一民族或國家之正義觀向全球推廣，在此過程中西方理論擁有霸權地位，西方文明優越的認定阻礙了文化平等。全球、普世性的正義理論應該要能應用到每個地方，在地方接受檢驗、修正並做出因應的調整，全球性和地方性的正義觀應要能互相補充。但何包鋼仍想發展出具有國際效力的全球正義，並認為中國的儒學正義觀點如何提出全球性的正義理論以對全球正義做出貢獻，是中國人應努力的方向。在本段內容裡，也批評過度強調地方疆界的民族主義框架思考，其對象已擴及西方國家、思想。

爾後何包鋼再介紹了全球民主理論，比較特別的是與之前提過的英文版本“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in Europe and East Asia”（全球民主與歐洲、東亞的民族認同）來比較，中文版較無對全球民主理論批評，而是談到該論點可提供中國新的思考方向。在此議題上他還談到儒家處

⁹¹ 韓非(西元前 281 至 231 年)，中國戰國時代的韓國貴族，其著作《韓非子》乃法家集大成之作。

理少數民族問題的討論，認為儒家的融合各族的大同世界理想是提倡多元族群的認同與和諧，但仍須以「權利」概念來做為避免少數族群受到侵害的保證，方能補充儒家的不足。最後，何包鋼論述了他對於文化多元平等願景的想法，希冀一個文化平等彼此尊重的世界。但也論述對外要能文化平等，必須先在國內保護內在的族群文化平等。何包鋼對普遍性的部分採取了比沃爾澤稍強的態度，認為世界不同文化應以人權原則作為共同遵守的基本規則，才能享平等價值，以避免對內在不平等的合理化。然而西方文化霸權主義與文化平等觀念之間的折衝，已是全球文化及民主的新課題。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何包鋼在後期的思想已有了相當的改變，最明顯的是對自由主義思想及文化平等議題有了反思，轉向了更多元開放的立場，且對於中國本身的文化及價值有了較多的正面肯定和自信。這種轉變首先可能與他長期在中國從事民主實驗以及研究中所看到的中國鄉村民主發展有關，另外則是許多西方學者也對自由主義做出批評，促成反思。雖然意識到現有自由主義論述中的西方特殊性元素，但自由主義仍是重要的價值思考來源之一。對何包鋼而言，一個普遍性理想的追求仍是可欲的，而普遍層次也確實存在，但必須透過共同建構的方式來在現實中對普遍層次做出實踐。更具體來說，以他對「權利」概念的重視為例，這個存在普遍層次的價值就必須透過各國對人權原則的遵守來在現實中實踐。然而人權原則此一普遍性的實踐，在現實中很容易受西方文化或國家過度占有詮釋權，使普遍性質效力下降，因此需要致力使各文化能平等的參與其中。

關於何包鋼對協商民主理論的想法，可從本書的後段看到。他認為協商民主是民主理論的新發展，並且是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反思。協商民主是一種讓大眾參與公共決策討論，以此作為決策依據的方式。協商民主理論假定人類具有一般的理性能力，可以藉由說理、溝通、協商議事等方法來解決人類之間的衝突，避免了暴力衝突及力量壓迫。協商民主更接近直接民主，強調公民大眾直接


參與決策，補充了自由主義代議民主、選舉民主的缺陷。協商民主重視諮商協調來解決問題，而非選舉民主所鼓勵的競爭，這與中國傳統講究和諧共識的觀念相符。也因為協商民主可以繞過選舉民主來先發展，因此吸引了一批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在中國現況下實質可行的模式。但何包鋼也認為協商民主和自由主義式的選舉民主是互相補充的，在中國國內目前較傾向僅將協商民主視為一種治理方式的新工具，如此使其發展會有侷限瓶頸，更有流於形式的危險。中國應當先發展協商民主，再發展自由選舉民主，以成為一個成熟完整的民主國家。何包鋼並且盛讚中國在協商民主的實踐上，領先許多其它西方發達國家，正在創造一種中國式的民主。

由於中國的協商民主發展多半在鄉村地區實行，因此有關協商民主理論的政治實驗、經驗實證性的研究的更多討論，將放在下一節介紹何包鋼的農村研究中。何包鋼對中國在協商民主上的表現有相當信心，自己並且在中國推動協商民主的進程。和過去研究所透露出的訊息相比，在協商民主的道路上中國是與其他西方國家在平等的位置上發展，甚至領先許多西方國家。這正是何包鋼所希冀的在文化平等的基礎上，各地對一個普遍性理想領域的發展各自做出貢獻，而何包鋼對於自己所屬的中國能在此進程中能有好的表現頗為振奮。在民主的形式上，他也不再如過去以自由主義的範式來刻畫中國應有的民主樣貌，而對中國自己的民主發展有著信心。

第四節 何包鋼的中國農村敘事

何包鋼的農村研究仍是在中國民主化的問題意識下進行的，他關注的角度有二，一是農村及農民所代表的基層民主在中國的意義及實行情況，另外則是 2004 年後他在中國鄉村推行的協商民主實驗。

中國從八零年代開始在鄉村試行選舉，成立代表村民管理自身利益的「村民自治委員會」，並多次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定調宣導下，由地方政府執行輔導鄉村自治的施行。這項政策建設引起各方的關注，許多人都想知道農村民主在中國的意義，並關切是否這是民主在現代中國的萌生。而一直關注著中國民主化議題的何包鋼當然也注意到這項發展，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合作，在中國進行基層民主的經驗研究，從 2000 年起發表一系列關於中國農村民主的研究論文。這一系列的研究有許多是和郎友興⁹²共同合作的，何包鋼當時是郎友興的博士指導教授。郎友興日後也成為中國當代重要的基層民主研究專家，並持續指導中國年輕學子加入這個領域研究。



何包鋼與郎友興合作在 2002 年出版的專書《尋找民主與權威之間的平衡：浙江村民選舉之經驗研究》，可作為主要的文本，另外還有在 2007 年以英文出版的 *Rural Democracy in China*（中國的農村民主）以及其它的論文輔助來觀察何包鋼對農村問題研究。在《尋找民主與權威之間的平衡：浙江村民選舉之經驗研究》中，作者群以研究團隊合作對浙江省各鄉村從事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對各鄉村的民主實踐狀況進行問卷調查，並且有訪談工作。在本書中將民主治理視為一種新的治理工具，著重於民主可以解決地方施政問題的效果，再三強調民主與權威可以達成平衡。可以看出本書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寫作，試圖能對實際的政策施行造成影響，而「重視實用主義」也是何包鋼很早就對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有的評語。也因此書中有許多內容在說服鄉村民主及民主制的正面效益，並與中國國內的觀點辯論，例如針對兩種在中國國內否定鄉村民主的主要看法提出辯駁。其一是針對農民素質水平較低落，不足以實行民主的說法。何包鋼反駁，在鄉村自治實行後許多新的方法是農民所創造的，民主技術並不困難。而民主化是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傳播後的一種自然所需，政治水平、文化程度不構成民主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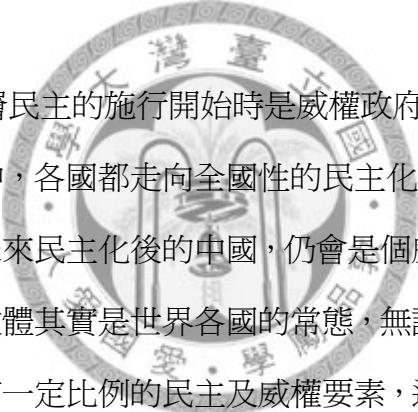
⁹² 現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系教授，是當代中國農村問題、政治民主研究的專家之一。

的障礙。農民只要稍加教育，就能確實實行民主權利，且農民對民主自治很熱情。有些村民選舉自治的制度法規，是先由農民創造後，才有法律再給予認可，中國已有過三次的普法教育使得農民法律意識已提高。其二是針對共產黨及政府權威將遭削弱的說法，作者反駁指出，鄉村自治仍需共產黨來領導協調，故是一種整全性政治秩序，亦即民主仍需權威領導協調，並不對立。民主是一種新的有效的治理方法，尋找民主與權威的平衡可使中國未來的發展更好。

本書對基層的農民表達出很大的信心，盛讚農民在民主實踐的表現。在菁英與基層農民的關係上，作者談到鄉村民主發展之初是中央政府決定推廣此一政策方向，由地方幹部承辦執行。因此在一開始時是由幹部督導動員村民實行自治選舉，也因此仍帶有一些過去動員政治的威權色彩。然而在選舉制度實行一段時間後，農民對於民主方法的熟悉已經有了顯著進步，甚至能對實際執行的技術性問題及方法表達修正意見。例如在程序制度問題上農民意見最多的候選人決定問題上，吉林省梨樹縣農民發展出「海選」方法，以大眾匿名投票來先決定候選人。談到此一「海選」制度的創造，作者表達極大的喜悅和讚嘆，認為這是證明農民的民主素質之實踐成果。某些地方仍有地方領導干預選舉的情形，而常使得村民出現極大反彈。此意味著農民會對民主有一種主動性，支持民主自治。所以可以說幹部的民主自治觀念，有時已落後農民的民主實踐。當公民、民主、效益等「進步」觀念被帶給農民時，農民能很快的接受使用並發現民主的好處進而主動支持民主自治。雖然仍要實踐學習從「傳統」轉化為「現代公民」，但因為其展現之相對應素質佳，因此現在就可以開始現代化、民主化。而轉化為現代公民的關鍵則在於「權利」概念的深植人心，以及將其制度化的憲政法治社會生活方式。

《尋找民主與權威之間的平衡：浙江村民選舉之經驗研究》著重在對中國國內政策能造成影響的經驗性研究，並帶有政策主張，2007年的 *Rural Democracy in China*（中國的農村民主）則是對中國的鄉村民主做了更全面性的論述，可以

看出這本英文的出版物是要介紹中國基層民主發展狀況給國際了解。本書對中國鄉村民主的發展過程及實際狀況做出介紹，並且肯定鄉村民主發展的意義。本書有許多內容是以《尋找民主與權威之間的平衡：浙江村民選舉之經驗研究》的研究為基礎，但由於發表的目的不全相同，因此有許多與國際上看待中國農村民主的觀點對話。書中對於某些外國學者對中國農村民主的否定提出辯駁，指出不能以西方式自由主義進程來評斷中國的民主發展。例如在他的分析研究中指出，當農村居民的生活越趨於都市化的時候，村民反而會對民主事務越不感興趣，這便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提出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的否證。何包鋼認為，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農村民主化是將民主的種子播下在中國的土地上發芽扎根，但在不同的土地上發展出來的形式不盡相同。



在各國許多農村基層民主的施行開始時是威權政府試圖解決行政問題以延長執政，但在經驗實證中，各國都走向全國性的民主化。何包鋼辯稱，不論是現在轉型中的中國，或著未來民主化後的中國，仍會是個威權與民主要素混合的政體，而這種混合要素的政體其實是世界各國的常態，無論在亞洲或著西方及其它地方，各國政體都混合有一定比例的民主及威權要素，這是何包鋼希望替中國辯護，使與各國尤其西方國家在知識地位上的平等。農村是中國民主化的起始、扎根的基礎工作，同時也是中國民主實踐最先進的地方，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何包鋼也指出一些鄉村民主實踐中的缺陷，例如婦女參與的不足、菁英幹部對選舉的影響、競爭性不足及形式化等問題，並從對民主實踐的影響做為對農村經濟、政治狀況的切入觀察角度。對於農村選舉民主的不足，何包鋼認為可以協商民主的直接參與來做為解決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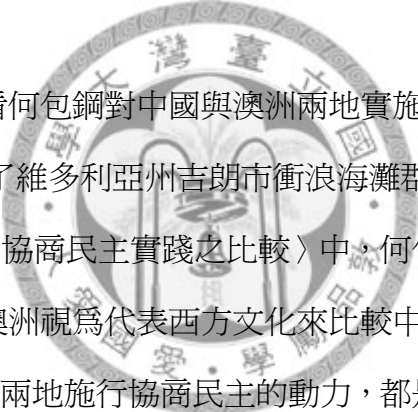
何包鋼自 2005 年起在浙江省溫嶺縣澤國鎮與當地政府合作，持續的展開協商民主的實驗及實踐。在中國各地其實已經有許多定期召開類似協商會議的「民主懇談會」，但何包鋼則在他所主持的協商民主會議中，強調要使用較嚴謹的社

會科學方法來從事協商民主的實驗。何包鋼認為地方性的民主協商會較易推行，但有時太過簡陋而流於形式；以社科方法及協商民主理論為依據的澤國鎮實驗則較嚴謹，但成本也相對較高。嚴謹且有公信力的方法，也可提高村民的信任度。另外，以理論方法進行的協商民主實驗也須依實際狀況做調整，例如何包鋼曾提到在實驗中原本集會次數過於密集，導致村民在後期意願低落，因此做了減少集會的修正。這裡可以看出何包鋼除了將民主在中國的推展視為使命外，亦嘗試能以學術來實踐理想。

何包鋼在〈中國鄉村協商民主：對一個個案的研究〉⁹³中談到，中國的鄉村村民自治雖然已經推行近 20 年，但似乎仍發生許多矛盾及衝突事件。追究原因可發現，雖然村民獲得了一定的選舉權，但實際上在日常能夠參與公共事務管理、決策和監督的機會卻很少。許多被選出來的村幹部我行我素忽略村民大眾的意見，或著仍須聽從地方黨部的命令，村民的權益受到壓迫和傷害因此爆發出衝突和不滿。何包鋼認為村民自治中的選舉民主並不是一種完善的民主，無法解決日益關鍵的公共利益分配問題，完善鄉村民主需要強化民主決策、管理和監督的民主運作。協商民主因此可作為一個有效的方法，協商民主在中國地方實行的動力來自村民對公共利益處理問題的關注，以及中央政府提倡和諧社會、制度革新的壓力。在這篇文章中何包鋼以他在澤國鎮扁嶼村所主持的協商民主會議做為討論案例，詳細說明他在鄉村的協商民主實驗。何包鋼認為只要具備一般性的說理能力，可以溝通協調及說服以試圖支持自己的想法，這就具備參與協商民主的條件了。而在實驗中，經指導訓練的村民很明顯的提高了說理能力，即使沒有經訓練的村民也仍具一定能力，因此村民的民主參政潛力是很大的。「平等」是何包鋼對鄉村民主協商所追求的重要價值，在具體實踐的過程中，平常階級族群的不平等仍反映在會議裡。從外地至當地打工的「新民」常顯得弱勢謙卑，不敢表達

⁹³ 何包鋼、王春光，〈中國鄉村協商民主：對一個個案的研究〉，社會學人類學中國網。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7/07/1388.html> (03/05/09')

意見，而村幹部則較一般村民展現更強的表達能力；然而可喜的是，針對是否要興建改善新民居住品質的「新民之家」此一問題上，原本由於許多村民都有將房子租給新民的租金收入因此不甚願意，但在了解新民的生活居住條件問題及找出不影響房屋出租的方法後，最後大部分參與者皆主張興建。興建公共廁所的支持度也從會前的 56.1% 上升到 80.7%，多數人主張公共廁所應興建在外來人口較多和公園等公共場所，且有 62.7% 的人主張不向新民收費。這顯示出多數參與者都有對全局和弱者的關懷意識，並經溝通、協調和說理後能對公共問題達成一定共識。另外，也對於婦女政治參與問題特別關切，關心是否每個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公共參與權利。而對於能在中國實踐全世界最科學先進的協商民主，何包鋼感到相當振奮，也對鄉村基層民眾相當有信心。



進一步我們可以再看何包鋼對中國與澳洲兩地實施協商民主的比較，何包鋼 2007 年在澳洲參與組織了維多利亞州吉朗市衝浪海灘郡（Surf Coast）公民陪審團的全程。在〈中澳兩國協商民主實踐之比較〉中，何包鋼首先比較了兩地協商民主實踐的異同，並將澳洲視為代表西方文化來比較中西文化下的協商民主實踐。在相同的部分，中澳兩地施行協商民主的動力，都是由於地方政府在公共決策上遇到困境，希望採用公開討論的方式，來解決社會矛盾的問題。其次，討論議題的背後原因，都關係到公共利益及人民生活利益方面的經濟因素。最後，兩地的實驗都有賴開明的地方領導人之支持，協商民主實驗才得以順利進行，而兩地的民眾也都在一開始時表現了對政府的不信任。在關於雙方不同之處，澳洲如同許多西方國家一樣，有著很強的選舉民主傳統，但這個傳統有時反而阻礙了協商民主的發展，被選舉出來的代表認為自己有民意基礎作為權威，對決策分享不感興趣。然而中國在選舉民主經驗較欠缺之下，許多地方政府領導人發展出各種協商民主的形式和實驗，以尋求民意支持其正當性，在協商民主的表現上展現更大的動能。就參與度而言，在中國由於政府動員能力強以及討論公共議題關乎利益而有較高參與度，而在澳洲反而出現因個人主義傳統及政治冷漠造成參與度低

落。在具體的實踐上，整體來說澳洲由於協商民主發展較早，因此在方法上較精細，也發展出專業的主持人職業；相對來說中國的協商民主做得比較粗糙，但都是探討實際生活上切身的問題。在協商過程中的觀念，兩國的基礎也不同。在中國，被抽到的代表有一種「公」的性質，他們有義務去參詢別人的意見以作為百姓發聲的代表；而在澳洲是基於對個人權利的重視，諮詢個人的想法意見。何包鋼對重視「公」的文化內涵表示肯定，談到 2006 年澤國鎮民主協商代表自發性的拜訪其它家庭進行討論，另外在中國的協商民主有時能在過程中透過個人利益的讓步犧牲，來達到大多數人都滿意的結果。而在澳洲則是從保護個人利益權利的基礎上談公利，重視個人隱私權。在這個問題上何包鋼並未區分優劣，但從前面曾經談到對儒家的想法可知，何包鋼希冀的應是一以「權利」概念做為基礎，再以「責任」來補充的政治互動關係，試圖結合中西方的優點在中國實踐。在協商民主的制度化上，在中國已經有一些地方規定固定召開民主聽證會，但也注意到有些時候後會流於形式化。另外，何包鋼則盛讚民主協商已經成為澳洲文化中生活習慣的一部分，也提到在中國各地也漸漸有這種新的政治民主協商文化，並認為當民主協商制成為中國文化的新傳統，此一制度才能扎根。

何包鋼認為中國的協商民主實踐雖然還達不到西方協商民主理念的高標準，但在實踐上是領先許多西方國家的。同時也認為不能用純自由主義理論來看中國鄉村協商民主，應認真看待民主在中國的創新和本土化。雖然曾經批評梁漱溟思想中的不足，但何包鋼也特別提到梁漱溟在近代致力於鄉村建設、提昇農民溝通理性能力的努力。鄉村協商民主的發展，或許是一種歷史基因的重新激活，繼續梁漱溟當年未完成的歷史使命。農村研究在何包鋼的研究中雖是在中國民主化的問題意識下進行的，但農村民主對他而言是民主目前在中國最重要的實踐，因此是極為重要的。農村也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基層的民主化、公民憲政深化是整個中國扎根轉化為現代進步國家的關鍵。這種「現代」、「進步」等標的來自於他所認知的普世理論層次，但他在後期也特別意識到西方理論特殊性的問題，體

認要注意多元性價值。另外，農村的基層民主也與他早年所受影響的平民主義符合，鄉村協商民主更能體現大眾平等參與的理想。

第五節 結構、境遇與行動－何包鋼與其中國敘事的綜合分析

中國的民主化是何包鋼一生的志業和關注，而這個熱烈的企盼來自於追求一個平等進步的理想社會，並透過民主制在中國實踐。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曾經沉重打擊了他對中國的希望，讓他意外走上了一條不同的生涯路線。出身中國且對中國的未來懷有熱烈理想抱負的何包鋼，決定留在一般認為屬於西方世界的澳洲，並從這裡成為了國際知名的學者、中國議題的專家，可以說在英語為主的國際世界、學界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與其說他成為了在中國外圍或是西方世界的人，更貼切的說法可能是他選擇了在一個中西世界皆可交匯的位置，扮演了中西橋梁的角色。正如他早期在 1996 年 *The Democratisation of China*（中國的民主化）開頭部份便意識到自己和其它西方學者的不同：

「只有對一個同時受中國和西方教育的研究者...填補民主理論與中國實踐的問題才會是極端重要的。」

在現實生活或者思想觀念上，何包鋼確實已經兼有了中西方的雙重背景，並選擇在這個位置上去追求推動中國的民主化。當回到中國時，何包鋼思考的是如何能最好的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並透過對西方理論及經驗的了解及介紹，來幫助中國民主化的發展，更在中國進行政治實驗。當面對西方時，何包鋼則試圖介紹中國的民主化及思想觀念，讓西方能夠較真實的了解中國對民主化的思考與實踐，減少國際上因對中國不了解而產生的誤解，並正視中國國內的思考想法，也讓中國能有較多平等參與國際社會的機會。

從本章的討論中，似乎可以看到兩個身份的何包鋼：一個是作為中國知識份

子的何包鋼；一個則是作為學者的何包鋼。作為中國知識份子的何包鋼擁有一種歷史使命感，和過去及現在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追求著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將民主化視為自清末以來中國知識份子所追求的未竟之業。在 *The Democratisation of China*（中國的民主化）中，他談到中國近代歷史，以及其間知識份子的努力與中國民主化的「歷史基因」。這樣的何包鋼敏於中國民族自信的建立，時時試圖讓中國和西方國家處於平等的地位，甚至能表現更為優越。中國很明確的是他情感和認同上的歸宿，因此身處國外並能在國際發聲的他，也試圖能讓國際了解、肯定中國，這是他基於這個角色在研究中試圖努力的工作之一。而作為學者的何包鋼重視普遍層次以及知識領域的貢獻，有著身為追求普遍知識的自覺，對學術專業要求嚴謹。何包鋼相信有普遍層次的存在，並追求社會科學普遍理論的思考發展以及普遍層次在現實中的落實，但後期也意識到現有理論中存在西方特殊性。因此可以看到他既推崇梁漱溟在基層為中國進步所做的努力，又批評梁漱溟在理論思想中基於民族主義出發而造成的限制。身為中國知識份子的何包鋼事實上也追求者中國的民族自信能夠在國際上昂首，他批評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擔心此概念被用來作為讓少數族群犧牲的理由。

「語言」的使用可能也是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在中英文的使用上有著不同的意義。在澳洲仍是一個英語為主流官方語言的國家，以中文發表的論文在學術上並不採計積分。但我們觀察何包鋼甚為豐富的著述，可以發現中英文作品比例大約各占一半。何包鋼的中文作品有著較強的政治意義，希望能實質性的對中國政治產生說服性的影響作用，也因此在用字遣詞上有時會顯得更為謹慎。在英文作品方面則有較多試圖在普遍理論產生學術貢獻的內容，並且在書寫上顧慮較少。

他的理論轉向，從思想上的自由主義，到在地協商的民主實驗，可說是一個向澳洲學術風格認同的轉向，將他從抽象理論帶離，並前往基層村級具體研究，


強調地方特色、中國特色等充滿主體的意識語言。

澳洲是何包鋼現實生活和從事研究的地方，何包鋼從這裡取得了成功，並在此繼續他的志業及興趣。在第一節曾說過，何包鋼認為在大多數時間自己在澳洲是個受益者。憑藉自身優秀的研究能力，何包鋼在澳洲取得了許多機會以及實質的研究基金資助⁹⁴。前面也曾提及，何包鋼曾有過一次印象深刻的求職經驗，並認為這種機會平等雖未被明文制度化，但已融入在澳洲文化風氣中成為重要的瑰寶。不過在何包鋼的研究脈絡中，我們並未看到一種澳洲本位影響他對中國的評價分析，比較多的是他自身思想信念的思辨問題。澳洲在他的文字中，是代表他在一個西方國家生活的實際體驗所呈現。澳洲文化中重視機會平等、保護個人權益等優良性的特色，來自於他所欣賞的西方自由主義中理想的層面，又或許可以說在初期他對自由主義的信念可能因此避免掉了一些掙扎。澳洲也是一個讓他可以進行普遍理論實驗的場域。在協商民主的研究中，澳洲扮演了一個可以進行政治理論實驗以及和中國做中西比對的角色。就普遍理論實驗而言，學術及普遍知識的意義比較大，然而做為一個可供他實驗的西方國家場域，澳洲實驗也提供他在思考如何讓中國民主化更好時，作為比對參考借鑒。整體而言，澳洲對他而言比較像是「資源」，而非一個提供動機或要求效忠的地方。

⁹⁴ 詳細獎項或贊助名目可參閱何包鋼教授的個人網站，網址為 <http://www.chinesedemocratization.com/about.html>

第四章 影響澳洲中國研究多元化的整體分析

本章試圖從整體性的角度來分析澳洲學界環境對外國赴澳學者處境的影響，與既有文獻相比，本文提出了：1、在澳洲具影響力的三種研究主張，都具有中國中心觀點及多元開放的內涵，並鼓勵各國學者的參與合作。2、擁有眾多來自外地學者的澳洲漢學界，形成了鬆散多元的社群性質，不僅易於來自外地學者的融入，也使研究更具多樣性。3、澳洲學界的「學科本位」觀點不強，在從事研究時所受的限制較少。4、澳大利亞由於地理、經濟及國力等因素，與美國相比採取了對中國較友善的態度，也因此影響兩國的中國研究氛圍不同。以上幾點觀察，是過去較少被注意的，本章希望能予以補充。



在本章前三節將分別介紹在澳洲漢學研究領域具有影響力的三種研究觀點或主張，分別是地方研究（Local Studies）、後漢學（New Sinology）以及史學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並試分析對外國赴澳學者的影響。第四節將討論其它整體性因素或特色可能有利外來學者的部份，以期讓讀者對澳洲漢學界的概貌有更多的了解，其中有部份內容是基於 2009 年 4 月赴澳與在澳洲的多位漢學家訪談所得。

必須先說明的是，雖然這三種研究觀點在澳洲漢學界具有較大影響力，但尚不能說在澳洲學界形成了有明確主流的研究範式。澳洲學界給予學者個人的空間頗大，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較少範式，因而自由度也較高。此外，由於學界有許多來自外國的學者，在自主空間較大的情況下，每位學者的方法論以自己過去所培養或接受的訓練為主，因此更有利於呈現多元的學風。一般赴澳的留學生也會接觸到許多不同的方法論，以致澳洲教育體系下訓練出來之研究者的同一性也不高。這三種觀點中，地方研究和後漢學都是當代澳洲漢學界較具影響力的觀

點，前者的代表性提倡者是古德曼 (David S. G. Goodman)，後者為白杰明 (Geremie R. Barne)。他們從澳洲發展並積極推廣論述，使這兩種主張成為具澳洲特色的漢學研究觀點。歷史研究途徑則是澳洲過去漢學發展的主要力量，雖然澳洲曾作為國際中國歷史研究基地的地位已逐漸下降，但歷史研究仍在澳洲漢學界留下深遠的影響，代表人物如費子智(C. P. Fitzgerald)、王賡武 (Wang Gungwu) 及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等。

第一節 地方研究

澳洲的中國研究目前以當代中國為主，對於古典漢學的研究僅有雪梨大學一直維持著傳統。而澳洲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有兩個最重要的機構，第一個是澳洲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另一個則是雪梨科技大學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簡稱為 UTS) 的中國研究中心 (China Research Center)。這兩個中心對於當代中國的議題研究都是綜合性的，但 UTS 的中國中心有一項在澳洲具特色和影響力的研究，名為「中國省級研究」(Provincial and Local China)。該研究是一個稱為「省級中國」(Provincial China) 的長期性研究計畫，始於 1994 年，由古德曼教授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學者發起，發起人中還有如杭智科 (Hans Hendrichske)、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以及 Barbara Krug 等在澳洲的學者。該研究計畫有各國超過 70 位以上的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化學者參與，其中也包含許多中國當地學者，並和中國的大學及研究中心保持合作。每年都會選在中國的某一省進行集會，並將會議論文編輯出版。1997 年起該計畫開始出版 *Provincial China* 期刊，成為 UTS 中國研究中心的代表刊物。

重視地方是本計畫在方法論上最重要的特色，並相當重視對在地進行田野調查的實際接觸。在初期以中國各省作為參與計畫者的研究區劃單位，近年則有往

更基層的行政區塊如縣、鎮及鄉縮小的趨勢。古德曼本人是以山西省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對象，他的研究領域相當廣泛，但有許多都是從山西計畫出發所做的延伸研究。我們可以從該計畫所發表的第一本書，1997 由古德曼主編的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轉型期間的中國省份：階級、社群以及政治文化）⁹⁵ 來觀察他對地方研究的思考。在本書序言古德曼談到，本計畫的初步目的是對各省在中國轉型期間的發展情況做出觀察分析，其中經濟發展、人群關係及歷史背景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議題，並進一步了解這些要素在各省相互影響的狀況。古德曼在本書中負責撰寫的論文“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更進一步談到，過去西方的研究習慣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忽略了中國內部的多樣性，而這是無法真正了解中國的。「省級中國」研究計畫不同意這種將中國整體化視之的方式，該計畫所要傳達的重要訊息是：沒有省份是「典型」的，各省份也沒有普遍共有的特色。古德曼將中國各省視為相對於中央的「地方」，而過去研究在對中國省級行政區的觀感上，普遍認為地方的狀況是中央政策及精英鬥爭的延伸，忽略了各地不同的條件環境及各省的自主性。為此古德曼特別強調，省級中國研究的焦點較不放在中央與地方關係或著各省對於經濟轉型政策的回應，而關注各省在轉型期間自身社經狀況的變化。古德曼認為中國各省份作為一個中層的行政區單位，對於國家整體的組成有重要意義，中央政府是整體中國構成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省級中國的計畫是將每個省視為各自有獨特的政經及社會系統來研究，而研究的成果並不宣稱有普遍性或代表性，只是龐大資料收集的第一步。另外，古德曼也談到，本計畫試圖對省級以下的行政區域作更多的延伸分析，期能描繪出地方的互動及活力。而在古德曼所發表的一篇名為“Mao and The Da Vinci Code: conspiracy, narrative and history”⁹⁶（毛澤東和達文西密碼：陰謀，故事和歷史）的書評裡，可以看到更多他對研究方法的態

⁹⁵ David S Goodman (ed) . 1997.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 Routledge .

⁹⁶ David S Goodman. 2006. “Mao and The Da Vinci Code : conspiracy, narrative and history” , *The Pacific Review*. 19(3) : 359-384.

度。在本篇文章裡除重申反對將中國整體化來研究的觀點外，也認為在研究方法上應講求邏輯和證據，因此田野調查的實證觀察相當重要。並且不應從單一研究裡宣稱瞭解了中國的全貌，試圖定調「中國」的性質。

從這兩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古德曼認為「中國」的內涵是極為豐富和複雜的，要真正了解中國，唯有透過長期性對各地進行考察的資料累積，才能逐漸了解「中國」的輪廓樣貌。地方研究重視田野調查，但這並非為建立普遍性理論分析，而是為了真正瞭解當地的狀況而做觀察。以瞭解當地為導向的研究，較不會有預設的理論立場，也易於認同該理念想瞭解中國的各領域學者加入研究計畫。例如費約翰在計畫中所發表的一篇文章“The province in history”⁹⁷中，他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在中國歷代類似省級的中層行政單位之重要性，認為各省的安定是中國各朝發展最基礎的前提。而在近代中國試圖重整國家結構的背景下，「地方」扮演了參與國家轉型的更為重要之角色，因此要瞭解中國就必須研究地方區域。Babara Krug在“Why Provinces?”⁹⁸這篇論文中，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討論為何需要省級研究。Krug談到經濟學家要釐清中國經濟的整體圖像時，省級作為一個中層單位並不會是他們馬上聯想到的重要線索。但從政治經濟學而言，經濟現象是各行動者間互動形成，在上下層的單位都是重要的行動者，省級研究有助於我們對瞭解中國政經完整圖像的資料累積。這些作者共通認同的是，中國研究需要地方局部的資料長期累積，才能逐漸看到中國的全貌，每一項研究所看到的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以瞭解中國地方為目的之研究，華語或方言的學習就相當重要，學者在研究中的角色是去觀察、分析及瞭解當地，不是理論的執行或驗證者，故對華裔或當地學者平等參與其間頗為鼓勵。而許多澳洲華裔移民的第二代子女，基於「尋根」的情懷，也相繼投入對中國的地方研究，希望能瞭解自

⁹⁷ 參閱John Fitzgerald (ed). 2001. *Rethinking China's Provinces*. Routledge. London.

⁹⁸ 參考資料同上，第 247 到 271 頁。

己的故鄉根源，成為澳洲漢學界加入中國地方研究的生力軍。⁹⁹就各國學者的參與來說，若能真正的瞭解當地，在研究上就較不會有預設的問題意識及立場，因此這種地方研究在澳洲的流行，是有利各地學者加入的。

第二節 後漢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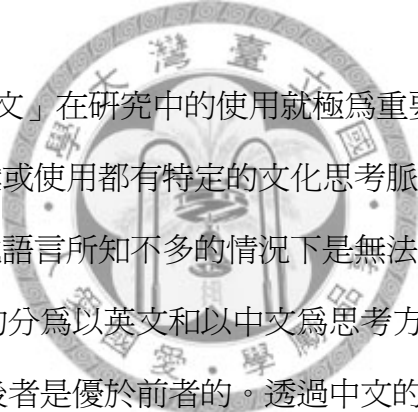
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是澳洲國立大學的教授，也是當代知名的漢學家。他能說流利標準的中文，並且和中國當代的許多知識份子有交往，甚至參與中國知識份子在國內的辯論。2005年白杰明教授和他的同僚創立了一部線上刊物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中國傳承季刊）¹⁰⁰作為他們「中國傳承」研究計畫的發表空間，而其理念是以白杰明為首的一些澳洲漢學家所要提倡的「後漢學」這種思維。由於白杰明本身的活躍和高知名度，以及一些認同該理念的學者的參加，便構成了學群，在澳洲有著一定的影響力，2007年當選的澳洲現任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澳洲國立大學攻讀中國文化、文學時即曾受教於他們。

「後漢學」是針對澳大利亞中國研究的變革思維，它所要區別的對象是過去那種基於國家戰略、經濟利益為動機所進行的中國研究。白杰明認為後漢學是以一種開放的態度，從世界的角度，以對人類關懷為出發點來作研究。內涵應該是豐富多元的，能包容各種角度的觀點及研究途徑。對於中國的關切及重要性，應更廣闊的著眼於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以及對文化產生的影響力，而不僅是經濟利益。白杰明教授提出「文化交疊」的思維做為一種新的身分思考方式，各種文化

⁹⁹ Henry Chan. 2001. "Becoming Chinese but remaining Australasian: the future of the down under Chinese past"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Australasia : history, settlement and interactions : proceedings*, eds. Henry Chan, Ann Curthoys, Nora Chiang . Taipei: Interdisciplinary Group for Australian Studies (IGA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¹⁰⁰ 網址為<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index.php>，本節參閱文獻多來自於該網站資料。

在世界擴散影響著人們，使得每個人事實上都受到複數文化的影響。而中華文化也是如此，透過各種方式的傳播而使中華文化影響的範圍能涵括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及人類。白杰明認為「華」文化應該是超越「漢」也超越種族的，是由各式各樣的族群參與其中而形塑出活力豐富內涵的「華文化」。而在華文化擴散至世界的今天，事實上我們（白杰明要特別提醒的可能是非漢人、各國的漢學家以及澳大利亞的居民）都是某種意義下的「華人」。一個澳大利亞的白種人可以同時也是西方人和華人，而能主動去參與並被包含在新的華文化之形塑過程裡。透過這種身分想像的轉化，漢學家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不再將中國視為一個從遠方被眺望觀察的客體，而能用一種「華」式的思考更全面性的了解中國。漢學家應該要認識到當代中國是「活」的，應該要能融入「華」的世界以及有人性關懷的素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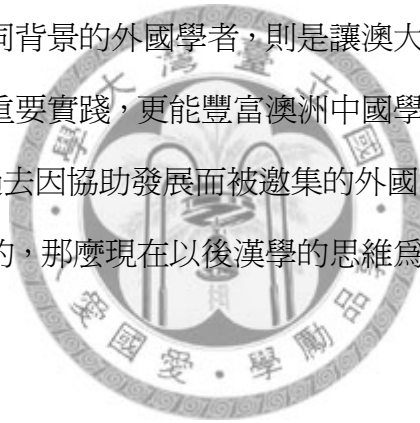


在這種理念下，「中文」在研究中的使用就極為重要，各種語言本身就蘊涵有文化思維，不論是詞彙或使用都有特定的文化思考脈絡。作為文化思考和溝通的方式，研究者在對當地語言所知不多的情況下是無法進行深刻之研究。如此在漢學研究中便可能模糊的分為以英文和以中文為思考方式之兩種中國研究，很明顯的在白杰明的論述中後者是優於前者的。透過中文的精通和上述自居「華人」的研究者身份，使自己與傳統定義上華人背景的研究者處在一個平等的地位。如此，白杰明與他同僚的研究既能優於其它西方學者，又必定不亞於中國學者。當白杰明展現能在中國的知識圈、政界參與往來，甚至參與辯論時，儼然是成為了中國知識份子學群內的一員，在思辨上也跨入了其它許多西方學者無法進入的中國世界。在接受訪談時，白杰明曾說：「我認為我是個中國人，不是外國人。」後漢學具體地將白杰明視為同時是中國人，也是澳洲人、華人及西方人，主張每個人都有一個在這個世界存在並且接受複述文化薰陶的身份。

而在具體的措施上，白教授認為澳大利亞應該推廣中文教學以及研究所需的專業中文訓練，以讓研究者更能融入華文化的世界及華式的思考。在研究方法

上應該秉持多元開放的態度，讓各種不同的觀點與途徑賦予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更豐富的內涵。透過結合澳大利亞的學術資源鼓勵吸引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漢學家，在澳大利亞形成一個豐富優質的漢學知識社群，期待澳大利亞能夠成爲一個開放性、世界性的中國研究中心。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後漢學的思考，其背後的意義是對於研究者身份想像的轉換，「可以同時是西方人和華人」這樣的思維，是一種對身分認同的開放鬆綁。要接受自己也是某種意義的華人，就要先把在澳大利亞的居民從「只屬於澳大利亞國民或著西方人」的這種身份想像解放至「世界」的領域，白教授也提到這種思維提供了澳大利亞人一種新的在世界存有（being world）的身份進行思考。廣邀吸引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外國學者，則是讓澳大利亞成爲一個開放性、世界性的中國研究中心的重要實踐，更能豐富澳洲中國學的內涵，有助於研究者從特定立場的解放。如果過去因協助發展而被邀集的外國留澳學者對澳洲研究風氣的影響是未被明確察覺的，那麼現在以後漢學的思維爲例，便是要將這種良性的影響鼓勵發揚光大。



第三節 歷史研究

史學研究過去曾經是澳洲漢學界發展的主要力量。費子智(C. P. Fitzgerald)是澳洲早期相當重要的漢學家，1954年澳洲國立大學成立遠東歷史學系，費氏即擔任系主任。費子智的著作豐富，在中國歷史文化、少數民族等研究都有成果。他在歷史研究方法上，反對站在西方的立場來研究中國歷史。費子智在其著作 *Revolution in China*（中國革命）¹⁰¹中認爲，應從中國社會本身的發展來解釋中國革命的發生和結果，並關切受到歷史事件影響最深的中國人。他批評歐洲中心

¹⁰¹ C. P. Fitzgerald, 1952, *Revolution in China*, New York: Praeger.

主義，認為以西方自身的觀點利益來從事中國歷史研究，將會得到扭曲的結論。在從事中國研究時，應重視中國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這種以中國自身出發為核心關切的歷史研究觀點，對澳洲漢學界產生深遠的影響¹⁰²。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就曾評論¹⁰³：

「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領域，『西方影響——中國回應』模式並不像在北美那樣成為一種典範…柯文教授所提到在北美出現以中國為中心作為研究途徑的最新趨勢，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裡是長期存在的。」

美國學者柯文（Paul Cohen）所提到的，是他歸結北美近年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打破了過去第一代學者常使用的「西方影響——中國回應」模式，而出現從中國自身出發的「中國中心」（Chinacentered）研究趨勢。費約翰認為這種中國中心出發的研究途徑在澳洲以行之有年，例如王賡武的海外華人研究以及馬克林（Colin Mackerras）的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等等，都是在這種思考途徑下所做的傑出研究。

1968年費子智從遠東歷史學系榮休後，由王賡武接任系主任，將澳大利亞的中國史學研究帶向另一個高峰。王賡武接任後首先確立了以歷史為該系發展的主軸，將過去在該系對中國文學與史學研究未明確區分的狀況改變。1970年起該系僅收主攻歷史的研究生，並培養出如馬克林、馮兆基、費約翰等許多優秀學者，這些學者日後成為澳洲對中國歷史研究的主力，還有一些則進入東南亞、歐美的學術社群。王賡武在任期間積極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每年並邀請許多外國學者來校訪問交流。他還積極參與公共活動，致力於改善澳洲人對亞洲的看法，對改善澳亞關係有著許多貢獻。在王賡武及其同僚的努力下，澳洲國立大學在70、80年代間成為國際上重要的中國歷史研究基地。王賡武教授除了中國古典歷史外，最著名的是對海外華人的研究。在研究中王賡武以「華人」為主要研究對象，

¹⁰² 胡再德，2005，《澳大利亞中國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頁42。

¹⁰³ 參閱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澳洲中國研究協會）的會刊 CSAA NEWSLETTER，2003年，第28期。

不僅止於政治或地理意義上的「中國」。這也特別被費約翰在前述談到北美與澳洲中國研究的文章裡提出，他認為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範圍是很廣的，以「中國學」稱之會聯想到以國家定義的「中國」，但在澳洲有如王賡武等從事的許多海外華人研究。以「漢學」稱之又隱含有種族意義，但澳洲有很多對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研究。費約翰認為以「中華」這個詞彙能包含的層面最廣，應以「華學」稱之較能捕捉到澳洲的中國研究內涵。


我們還可以從費約翰一篇與白杰明所提倡的後漢學辯論的文章“*The New Sinology and the End of History*”（後漢學和歷史學的終結）¹⁰⁴來觀察歷史學在澳洲的樣貌。費約翰談到歷史學在澳洲一直是個很開放的學科，相對於其他學科如人類學、經濟學及社會學等，可以成為「歷史學家」的標準是相當寬鬆的，例如任何一個關切國家議題並出版發表文章的人，便可以宣稱自己是個歷史學家。他認為歷史學在澳洲是開放的公共資產，這種寬鬆的認定鼓勵各種對文化傳承和公眾回憶有興趣的人參與歷史研究。

費約翰批評在後漢學強調要體會華式思考的觀念背後，預設了研究者的身分是非華裔背景。而重視語言訓練與翻譯的主張，則是想像讀者群以西方世界為主。另外，他認為後漢學較重視當代中國，在方法論上則最依賴語言學和美學詮釋，而歷史學僅成為了解華人思考背景的工具，如此是嚴重破壞了歷史學的內涵。費約翰認為後漢學的這些觀點，事實上是破壞了歷史研究的多樣性，而以他們認定的新價值來做為評價標準。最後，費約翰認為後漢學如果在澳洲國立大學全面實行的話會有兩個負面影響，第一是研究生在研究上將受到許多限制，第二是過去曾取得成功但現在被定義為「舊」的方式將會被壓抑，然而這並不能回復澳洲曾作為國際上重要的中國歷史研究基地的地位。白杰明認為費約翰對他的後

¹⁰⁴ 參閱澳洲中國研究協會會刊 *CSAA NEWSLETTER*，2005 年，第 32 期。

漢學觀點有所誤解，但並沒有公開的回應發表¹⁰⁵。

從費約翰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澳洲在中國史學研究上的寬鬆多樣性質，沒有嚴格限制的方法論科律，有利於各方研究者的參與，這和澳洲漢學界的整體現況是類似的。而過去史學提倡以中國為中心出發從事研究的觀點，其實在地方研究和後漢學中也都可以找到類似的精神，歷史研究也與這兩個主張有所結合。雖然傳統歷史研究近年在澳洲中國學領域的影響力逐漸下降，而以對中國現況的關注為主流，甚至在澳洲 1975 年後成立的大學已不再設立歷史學系。但歷史學做為過去澳洲中國研究發展的重要力量，其經驗和精神已融入澳洲的中國研究，形成深遠的影響。



第四節 其它整體性因素及待探討的特色

澳洲中國研究領域還有一些其它整體性因素或特色，可能對外地赴澳的研究者有正面助益，而這些因素彼此是有關聯性的，以下分為五點說明：

一、外國學者主導的傳統？

在序章曾經介紹，澳大利亞的中國學在發展之初由於沒有漢學研究的基礎，因此必須仰賴從外國聘請學者來幫助自身中國研究的發展。自雪梨大學成立東方語文學系的 1918 年到 1947 年停開止，此一階段澳洲和英國的從屬關係仍十分顯著，主要依賴英國的研究支援。1955 年在各界的呼籲下，東方語文學系復開，聘請英國人戴維斯（A. R. Davis）為系主任以及數名英美、華裔教授。戴維斯在任期間和其他教授為該系的規劃發展做出許多貢獻，並組織了澳大利亞東方

¹⁰⁵ 筆者於 2008 年 11 月曾與白杰明教授通信請教他關於這篇文章中提出的問題。

學會。澳洲國立大學則於 1946 年在坎培拉創建，並於 1953 年成立遠東歷史學系。由出身英國後移居澳洲的著名漢學家費子智(C. P. Fitzgerald)為系主任，爾後 1968 年接任的王賡武則把遠東歷史學系帶向另一個高峰。五、六零年代開始培養的澳洲本地研究人才，也在七零年代展現成果，而這批培養成為本地研究力量的學者，除了在澳洲本地成長的人之外，有許多是歐美及華裔背景，形成了有多樣背景的研究社群。

這種由外國聘請學者主持而取得成功發展的經驗，使得該領域持續採用這種經驗模式。而由外地聘請來主持的學者，在人才選用上也樂於吸收其它同樣自外地聘請的優秀研究者。外國學者可以取得主導權的歷史傳統，也會讓在學習過程中有此共同經驗的新一代學術社群養成開放的習慣。而澳洲國立大學及雪梨大學作為兩個澳洲漢學發展的中心，所培養的人才帶著學習過程中有的這種經驗到其它學校任職，和其它持續外聘進來的外國學者組成了現有的漢學研究學術社群，形成了友善外國學者進入的環境。或許可以說，澳洲漢學研究一開始學術基礎的缺乏，反而形成了利於外國學者進入的契機。

二、移民社會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效應？

前述學術社群背景的多樣性，除了外聘學者成功的經驗外，本地培養的人才也能背景多樣，可能須歸功於移民社會的效應。由於新移民的持續移入，使得澳洲社會的族群構成呈現越來越多樣化的，也讓所謂「本地人」的背景中更多元。在七零年代澳洲政府廢除白澳政策，改以多元文化政策做為主軸後，此一趨勢更加明確。白澳政策的廢除讓更多亞裔的人民願意移入澳洲，此一由國家提倡對中國友善的態度，對漢學界也有正面助益。雖然在澳洲的漢學研究領域中，由於研究主題以及有許多學者喜愛中國文化的因素，使得白澳風氣不易影響到漢學界，但整體社會氛圍對亞洲的不友善態度，仍使本學門不被大眾重視，招生也不易。

多元開放後最大的特徵是，有更多華裔背景的研究者及學生加入了澳洲漢學研究的團隊或合作計畫，整體社會的氛圍對於學界招聘研究者有了更進一步的開放¹⁰⁶。在九零年代還有另一個關鍵的政策事件，使得澳洲各大學不得不對招收外國學生採取更積極的態度。澳洲的大學院校幾乎都是國立大學，在運作資金上也仰賴政府挹注為主。九零年代澳洲經濟景氣不佳，澳洲政府陸續從大學撤走部分資金，各大學開始必須自籌運作資金來源。招收外國學生是其中一項方法，其中尤其以亞洲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學生最多。另外，持續加入的移民也成為常態，社會風氣對於在領域中有各樣背景或從其它地方持續加入的人感到習慣。

三、鬆散多樣的學術社群構成？

陳佩華曾談到¹⁰⁷，澳洲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中，真正土生土長的澳洲人很少，大部份學者皆來自世界各地，很難找到一致的澳洲角度或立場，所有的研究全憑個人學術興趣。這段話除表達出澳洲漢學界多樣性構成對整體學術立場的影響外，還蘊涵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亦即在澳洲漢學界內學術社群的關係結構並不是那麼的緊密，在研究進行上以個人為主。一個背景多樣並且不斷有新的學者加入及移出的學術社群構成，並不容易形成一個權力結構關係明確的社群以及集體文化。在澳洲除了長期聘請的學者外，每年還有許多訪問學者來到這裡做研究合作，學校鼓勵這種海外交流的風氣，更增添學術社群的流動性。這樣的好處是從外地來加入的學者較不會有自己是「不一樣」的這種感受，因為構成社群的，大部份就是從世界各地而來的研究者。因此安戈在受訪的時候說他沒有感覺到自己來到澳洲後是個「圈外人」(outsider)，因為事實上他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同事幾乎都和他一樣從各地而來，沒有需要打入既有緊密結構、集體文化的問題。而何包鋼也可以在和澳洲學界沒有太多交往的情況下，以自己的興趣及關懷為主

¹⁰⁶ 胡再德，2005，《澳大利亞中國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¹⁰⁷ 涂成林，2002，《澳洲觀察》，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進行研究並取得資源。既然沒有一致的立場，也就較不會形成主流對個人的干預，因此可依個人興趣從事研究，事實上也就意味著個人有著較大的自主空間。

在學校與教師關係方面，頗能尊重學者的自主性並以方便學者為主。舉例來說何包鋼教授曾在受訪中表示，澳洲的大學教授在收博士生的自由度上很大，如果有欣賞的學生但是為不同的校籍，只要經簡單的申請，學校會在行政方面盡量配合教授。另外在學術論文發表積分的要求程度上，許多受訪學者表示相對其它地方壓力較小。這種個人化程度較高、個人自主性較大的狀況，是澳洲中國研究學術社群的一項特色。鬆散聯結的社群組成，讓即使是團隊合作的計畫，也仍讓內容呈現有較高的多元歧異性。當然，從反面來說如果當地學術研究呈現多元廣泛性，可能在單一觀點途徑的深化上，就缺乏高效率來集中研究力量。

四、學科本位不強？

許多受訪的學者同意，和美國的學術研究環境相比，澳洲有一項較明顯不同的特徵，即澳洲不像美國有很強的學科本位觀念（discipline）。這種學科本位強的意思是，學術研究依學科分類在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框架下進行，各學門有自己長期發展所累積的知識體系以及研究科律。而在學科本位觀念不那麼強的澳洲，「中國研究」本身就可以成爲一門研究學門，也有例如王賡武所提倡從事的「南洋學」，甚至研究議題可以成爲一個專門的研究學門。這個差異對於研究者的影響是，在從事研究時，在澳洲所感受到的限制會比在美國時來的較少。議題導向爲主的研究學門，由於在方法論上可同時使用各種學科，因此各個研究設計的導向呈現寬鬆多元。以中國研究爲例，用「中國」做爲研究學門的主體，可以從經濟、政治、社會、歷史甚至自然生態來研究，而這些方法的使用都是爲了「瞭解中國」。在一個中國研究中心裡會有各種專長領域的人才，對於彼此的聯結干涉較弱。而一個以學科本位出發來研究中國的立場，其目的可能主要

在於自身學科普遍知識理論的驗證發展，而將中國作為一個案例研究。如此是以學科理論為主，中國在研究中的角色容易成為客體，而學者也要基於學科知識的假設作為研究問題的出發點，這是當該學門的學科本位很強時會發生的情況。

五、中國崛起對澳洲的意義和美國不同？

另一個在澳洲及美國從事中國研究時造成不同影響的差異因素，是對國家的態度。面對中國崛起，美國及澳洲似乎有不甚相同的反應。美國將中國視為一個新興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及威脅的對象，在媒體報導及研究中都特別針對「中國威脅」的論述有所回應。這種以國家為對象的基本視野，對美國學界頗有影響，從五零年代開始的比較政治、國際關係研究，主要便是基於要面對中國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所進行的。這種觀點的流行，使研究者必須注意輿論，也就產生了在序章曾提到的一些在美華裔學者的掙扎。對傳統上認定過去屬於西方世界的澳洲而言，情況則不盡相同。在澳洲的兩個主要政黨是自由黨和工黨，1970年代前長期執政的自由黨一般被認為是較保守的，採取親近英美的傳統政策；工黨則是改革派，七零年代首度執政後正式廢除白澳政策，定調多元文化為國內政策主軸，並立刻對亞洲採取積極正面的政策態度，包括與中國友好。

此後，在澳大利亞各界開始了對澳洲自我身份定位與亞洲關係的廣泛討論。在工黨及自由黨的輪流執政下，從1982年工黨總理霍克加快「親近亞洲」的政策，1992年的總理基廷更進一步的提出澳洲要「融入亞洲」。及至1996年保守派的霍華德當選總理，認為基廷的亞洲政策走的太快，將政策重新定位為「西方在亞洲的代言人」以及「亞洲與西方的橋梁」。¹⁰⁸2007年陸克文當選總理，工黨再次執政，陸克文是西方世界首位精通中文的領導人，並喜愛中國文化，他基

¹⁰⁸ 參閱〈澳大利亞跟誰更親〉，中國新聞網。<http://www.cns.hk:89/2000-09-06/26/44967.html> (07/24/08)

本上延續澳大利亞要做「亞洲與西方橋梁」的政策基調，但在實踐上對亞洲及中國可能採取更親善的態度。

無論是工黨或者自由黨，由於地理位置及澳洲在經濟上對亞洲的依賴，使得中國崛起對澳洲而言並不必然只是壞事。由於中國崛起代表在經濟利益上更多的機會，使得保守派也需正視與中國的關係。另一個影響「中國崛起」對美國和澳洲反應不同的原因是，相較於美國及中國，澳洲太小，做為一個區域性中等強度的國家並沒有像美國一樣有著霸權地位被威脅的焦慮。澳洲在政策上尋求的是如何與中國及美國都有良好的關係，甚至是能在中美關係間扮演一個化解的角色。北京奧運期間，現任總理陸克文在大使館接受《財經》雜誌¹⁰⁹專訪，被問到中澳關係時便曾打趣的用中文說：「別說了，我就是個小伙計。」如此生動的形容，釋放出尋求合作的訊息，也意識到國家強度的不同。同樣的，對做為澳洲在外交安全上重要靠山的美國，傳統上也有著很強的依賴合作關係與經驗。這種差異造成對中國不同的態度，既然澳大利亞在現實上未將中國作為主要競爭對手，學術上自不必非要求從掌握對手的態度來研究。

¹⁰⁹ 參閱胡舒立、王爍、王歡，2008，〈沒有開放政策，就沒有奧運會〉，《財經》，(17)。

第五章 比較與結論

第一節 安戈與何包鋼之比較

郭佳佳在《離散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政治學趙穗生，鄭永年面對中國的身份策略》一書中，比較趙穗生及鄭永年兩位華裔漢學家的研究。鄭永年及趙穗生都展現出為中國辯護的傾向，對抗在西方世界中甚為流行的中國威脅論。但郭佳佳發現由於鄭永年所處的新加坡對中國的態度較友善，因此在研究上較不需刻意處理自己的華裔身份，並可直率追求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角度。而旅美的趙穗生則似乎常必須包裝自己與中國的聯結，以兼採各家學說作為研究分析的策略，夾帶來自中國的看法，並特別強調「中立」、「客觀」及「綜合」等無個人立場的多元並陳風格，郭佳佳認為這其實是反映了他所處的環境。孟祥瑞在《到西方寫中國大歷史：黃仁宇的微觀經驗與美國的中國學社群》的書中，也深刻的分析了華裔的黃仁宇在美國學術界使用中國史學觀點所遭到的挫折，即使他試圖以西方語彙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但仍然無法通過西方的學術審查。不認同西方直接以現代社會科學分析傳統中國，卻又無法說服西方學界的黃仁宇，在心灰意冷之際也開始放棄了和美國學界的溝通。在本文的二、三章曾分別討論安戈與何包鋼的境遇與研究，透過兩人的比較，可以發現更多關於身份認同、環境與研究關係的訊息，也可和上述兩本著作的研究對照。

首先，何包鋼及安戈在身份背景上有所不同，安戈的美裔背景是屬於所謂的西方世界，而何包鋼則是來自中國的華裔學者，他們都選擇了前往澳洲並長期留居，在澳大利亞從事中國研究，且終能有所成就。安戈的研究方法較接近在澳洲漢學界有影響力的地方研究，藉由實際前往中國地方觀察所累積的資訊來進行研究。而何包鋼在研究方法上較接近美國的實證主義傳統，重視理論假設與實驗方

法。在何包鋼的研究中，政治思想是理論假設的重要來源，但對安戈而言，政治思想則只是輔助工具。這個方法論上的差異，也可從他們的身份背景找到一些線索。安戈來自西方的背景，讓他意識到自己對中國的不熟悉，其研究目的首要以瞭解中國實際情況為主，不急於在政治思想上歸納中國的屬性。而何包鋼則有著中國知識份子的身份，中國內部的實際情況對他而言不是謎團，他所關注的是如何找到中國未來的出路，因此需要有政治思想做為指導，而民主理論就是他對中國未來藍圖的設計依據。無論是何包鋼或安戈，在從事研究時其實都有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安戈的研究固然時常與西方學者對話，但能明確的指出一些西方學者從自身觀點出發評論中國而未實際去瞭解中國的錯誤。何包鋼則在早年的著作中就指出自己是兼有東西方背景的研究者，從未隱藏自己對中國的熱愛及關切。值得注意的是，何包鋼早期對自由民主的信念是符合西方主流觀點的，不過他後期思考發生轉變，已能直接對自由主義提出反省，並轉而為中國現實情況不符自由主義思想的預期多所辯護。

對於中國轉型的思考，安戈雖然希望中國走向更開放與更自由的方向，但在文字的使用上非常謹慎，避免擺出居高臨下開藥方的姿態。相對於何包鋼早期對自由民主的大力主張，安戈避免使用中國應該「民主化」等字句。這是由於熟悉西方語境的安戈，擔心自己的主張會被誤解為和他所批評的西方學者一樣，一味基於西方理論去要求中國未來的走向。他認為中國應更自由開放的主張，是實際和中國民眾相處觀察後產生的想法，因而是和當地民眾需求站在同一立場的主張，具有現實性，不具備意識形態上的指導作用，因而表現出尊重在地想法的敏感度。何包鋼雖早期有著對自由主義及普世民主理論的信念，不過他充滿了為中國找到出路的熱情，可見他的研究動機超越自由主義的範疇，並在後期累積經驗後，也開始擺脫自由主義的窠臼，轉而尋找某種中國式的民主。何包鋼對中國民主化的追求是基於一個知識份子對國家的熱愛，是延續自清末知識份子追求理想社會的使命感。

何包鋼對中國民族主義有所批評，擔心因此造成壓迫少數族群並形成反對民主化的藉口，所以不是從中國威脅論的角度在反省。對中國威脅論的討論幾乎未出現在何包鋼的研究之中，反倒是安戈在其編著 *Chinese Nationalism*（中國民族主義）中曾認為，中國民族主義和世界各國的民族主義並無差異，且並非中國威脅論所宣稱的那麼具有攻擊性，這意味著何包鋼更關心中國農民的自由權利，而安戈則必須處理西方社會對其自身生活方式加以維護所產生的憂慮。她們都與自己母國的立場不同，何包鋼沒有像國內學者那樣替中國民族主義辯護，安戈也沒有像美國學者那樣對中國民族主義疑懼。澳大利亞寬鬆而個人化的研究環境，既容許他們保留與母國知識界的互動，也賦予他們開展獨立自主性的知識空間。

關於如何看待中國農民的部分，安戈相當同情在社會結構中居於弱勢的農民，並關切他們真正的需要為何，符合澳洲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傳統，從中國農民自身瞭解其處境和需要。而何包鋼則看重一向被輕視的中國農民之潛力和能動性，他認為民主是有利整體社會運作的方式，而農民在民主運作上展現出良好的智慧和能力，反倒是菁英幹部有時已落後於農民。

何包鋼的中國研究，是他的普世性理想期待和對國家關切情感之結合。他的研究有時表現出中國中心式的思考，有時又呈現以普遍理論來檢視中國的特色。他的學思生涯中呈現出對自由主義信仰的掙扎與轉變，他的思考變得更加多元開放，但在自由主義與「中國式民主」之間尋求調和時，迄今尚難看出明確的立場。而安戈在研究取向上則並無太大的改變，他總是盡量蒐集並尊重在地觀點，且刻意與從西方觀點出發來檢視中國的學者有所區辨。由兩位學者的研究歷程來看，似乎澳洲環境對於他們形成具體的思路影響有限。澳洲環境的影響，可說是一種前提性的，讓安戈得以不受限制的發展，也讓何包鋼可以有跳脫自由主義框架的機會。他們都得利於寬鬆而個人化的研究環境，習於澳洲知識界重視微觀研究的

風氣，進而展現一定程度以發現研究對象視野為目的之職志，然後再與西方學界對話。然而這或許也表現為澳洲漢學界的一項重要特色，即澳洲漢學界仍屬於英語學術圈的一部分，西方學界仍最為澳洲漢學界所重視，但澳洲學界可能提供了研究者更多的空間，從中國本身發掘出和西方主流學界辯論對話的異議。事實上，澳洲學界與中國的關係也是西方學界中與中國較為友善的。

在此以簡表列舉安戈及何包鋼比較的數個項目，以便讀者閱讀。

比較項目	安戈	何包鋼
原出身背景國	美國	中國
研究方法特色	實證田野觀察或訪談，重視真正瞭解當地，理論為輔助形容的工具。	思想理論為重要基礎，亦重視實證經驗研究，更推行政治實驗及實踐。
對中國轉型的看法	更自由開放但不是依民主理論轉型，尊重當地人民的希望。	追求民主化，思想從自由主義式民主轉變為更多元開放。
對中國農民之關注	關注農民之生計問題	農民政治潛能與能動性
澳洲的角色	舒適研究環境	資源的提供

第二節 薄紗下的多元——澳洲的漢學研究

澳洲的漢學研究社群，由於歷史發展經驗、政策提倡、經濟利益、社群構成等因素，形成了較有利外地學者加入的環境。當外聘學者成為常態，來自各地的學者構成當地學術社群中的主體，該社群自然具備了多元性，於是外來學者也就

不稱其為「外來」。由於原先來自外地的學者加入當地學術社群一段時間並生根後，本就很難再稱說是具有「外來」性，反而是豐富了該社群的組成，這時所謂「外來」就已然是一種內生的性質。與美國相比，澳洲的漢學研究由於發展之初受到幾位重要外國學者的影響，長期有著重視在地的特色，也就是費約翰所說的以中國中心來研究的傳統。

雖然就澳洲政府來說，對中國研究的鼓勵主要仍來自於本國經濟利益，但由於在經濟上對亞洲的依賴以及其國力沒有將中國視為對手的必要，使得官方對中國的態度相對美國較為友善。另外學界的鬆散構成關係，以及漢學發展之初仰賴外國學者的影響，使得學者能擁有較大的自主性。在這數個條件的配合下，澳洲漢學界成為提供資源環境且讓學者能較不受干擾的從事研究之處。

整體觀之，澳洲的漢學研究因為給予學者較大的自主空間以及有著眾多來自各地的研究者，確實展現出較多元的樣貌。而這些來自外地加入的學者也為澳洲漢學作出重要成果貢獻，除了第四章歷史研究所論及的幾位重要學者外，提倡地方研究的古德曼是猶太人，杭智科則是德國人，還有如本文所討論的美國人安戈及華人何包鋼、華人陳佩華等，都對澳洲的中國研究的成果有著重大貢獻。至於澳洲本地生長背景的重要學者如費約翰、白杰明等，更都競相表現出對中國在地觀點的靈敏與開放性。澳洲的漢學研究社群既有著眾多來自各地的學者，而本地的學者亦習慣於此情況，由此觀之澳洲漢學界似乎以國際學群的方式呈現。

多元性除展現在研究者的身份構成上，也展現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比如，不從學科或宏觀理論出發，擺脫了條條框框與意識型態，容許研究對象各自展現主體性，而不論這個研究對象是農民、村、鄉或少數民族等等。安戈與何包鋼在研究方法上重視在地觀點，就預設了多元性與基層主體性。

然而澳洲漢學界仍非以多元性為其唯一的構成，而是繼續籠罩在一層西方屬性的薄紗之下。首先，即使在澳大利亞中國研究領域充滿中國中心意識，學界也僅承認英語發表的研究，至於何包鋼滿盈的中文研究，則是出自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的願望而作。澳洲學界積極與西方學界對話辯論的情況，說明英美學界仍最被重視，故對澳洲有著最強的影響。另外，即使澳洲學界有較高的自主性，但仍多少承載著澳洲國家社會整體的定位。澳洲雖以多元文化為政策基調及理想，但英美傳統仍居於主流強勢。澳大利亞各界目前對自己的期許，是成為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橋梁，以及西方國家在亞洲的代表，因此仍然屬於西方世界的一員。在澳洲的社會互動中，能良好的使用英語溝通仍是在當地生活獲得尊重的初步條件。種族歧視的情況雖日漸改善，但在澳洲仍時有所聞。多元文化風氣在澳大利亞的貫徹，仍是一項未竟之業。澳大利亞漢學界由於其專業性以及發展經驗，能較一般社會呈現更加多元平等的風氣，但英語學術圈仍是澳大利亞漢學界參與發表最積極的地方。允為薄紗下的多元。



附錄：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依姓氏筆畫排序）

石之瑜，1999，《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五南出版。

石之瑜，1999，《政治心理學》，台北：五南出版。

何漢威，1983，〈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3)：185-191。

何包鋼，1988，〈羅爾斯的政治自由的概念：兼論大陸與台灣的政治自由〉，
《中國論壇》，(321)：71-80。

何包鋼，1990，〈民主的烏托邦：Barry Hindess 的民主思想〉，《中國論壇》，
(361)：48-53。

何包鋼，1998，〈全球民主、跨國問題與邊界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
22：145-150。

何包鋼、郎友興，2000，〈浙江村民選舉的政治競爭〉，《中共研究》，34(5)：46-59。

何包鋼、郎友興，2001，〈大陸村民選舉與自治制度中民主性的生長與發展〉，《中
共研究》，35(12)：85-96。

何包鋼、郎有興，2001，〈步雲困境：中國鄉鎮長直接選舉考察〉，《二十一世紀》，
64：125-136。

何包鋼、郎友興，2002，《尋找民主與權威的平衡：浙江村民選舉之經驗研究》，
武昌：華中師範大學。

何包鋼，2004，〈三種全球正義觀：地方正義觀對全球正義理論的批評〉，許紀霖主編，《全球正義與文明對話》，南京：人民出版社，頁 69-89。

何包鋼，2005，〈中國協商民主制度〉，《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35)：13-21。

何包鋼，2006，〈協商民主之方式〉，《學習時報》，2月13日第5頁。

何包鋼，2008，《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何包鋼，2008，《民主理論：困境與出路》，北京：法律出版。

李龍華編著，2003，《澳大利亞史：古大陸·新國度》，臺北：三民。

何培忠主編，2006，《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汪詩明，2003，《20世紀澳大利亞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學。

涂成林，2002，《澳洲觀察》，廣東：廣東人民。

孟祥瑞，2007，〈到西方寫中國大歷史：黃仁宇的微觀經驗與美國的中國學社群〉，《國家發展研究》，7(1)：69-92。

胡再德，2005，《澳大利亞中國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馬克林原著，劉明新譯，1997，〈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研究〉，《世界民族》，(2)：78-81。

黃源深、陳弘，1994，《從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亞文化簡論》，台北：淑馨。

陳佩華 (Anita Chan)、趙文詞 (Richard Madsen)、安戈 (Jonathan Unger) 著，孫萬國，楊敏如，韓建中譯，1996，《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香港：牛津大學。

陳佩華，2001，〈全球化、社會條款與中國工人〉，常凱、喬建（編），《WTO：勞工權益保障》，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頁 270-287。

郭佳佳，2008，《離散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政治學趙穗生，鄭永年面對中國的身份策略》，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劉渭平，1995，〈漢學研究在澳洲〉，林徐典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歷史哲學卷》，北京：中華書店，頁 244-250。

鐘保賢，2000，〈口述歷史的社會意義〉，《當代史學》，3(3)：。

Beverly Hooper 原著，澹烟譯，2001，〈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國外社會科學》，(5)：83-85。

Donald A. Ritchie 原著，王芝芝譯，1997，《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

Edward W. Said 原著，彭淮棟譯，2000，《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台北：立緒文化。

Tim Wright 原著，劉霓譯，2004，〈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中國學比較〉，《國外社會科學》，(6)：64-68。

英文文獻 (依字母排序)

- Chan, Anita & Hongzen Wang. 2004.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Workers' Conditions: Comparing Taiwanese Factories in China and Vietnam." *Pacific Affairs* 77(4): 629-646.
- Chan, Anita. 2002. "Culture of Survival: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the Prism of Private Letters." In *Popular China*, eds.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Pickowicz. Boulder: Rowman & Littlefield, 163-188.
- Chan, Anita.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M. E. Sharpe.
- Chan, Anita, Benedict Kerkvliet & Jonathan Unger (eds). 1995. *Transforming Asian Socialism: China and Vietnam Compared*. Sydney: Allen and Unwin;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han, Anita & Richard Madsen & Jonathan Unger. 1992.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n, Henry. 2001. "Becoming Chinese but remaining Australasian: the future of the down under Chinese past."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Australasia : history, settlement and interactions : proceedings*, eds. Henry Chan, Ann Curthoys, Nora Chiang. Taipei: Interdisciplinary Group for Australian Studies (IGA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15.
- Fitzgerald, C.P. 1952. *Revolution in China*. New York: Praeger.

- Fitzgerald, C.P. 1952. *Revolution in China*. New York: Praeger.
- Fitzgerald, John (ed). 2001. *Rethinking China's Provinces*. Routledge. London.
- Goodman, David. S.(ed). 1997.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Goodman, David. S. 2006. "Mao and The Da Vinci Code : conspiracy. narrative and history." *The Pacific Review* 19(3): 359-384.
- He, Baogang. 2007. *Rural democracy in China: the role of village el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e, Baogang. 2006. "A Survey Study of voting Behaviou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Zhejiang."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3): 225-246.
- He, Baogang & Ethan Leib (ed). 2006.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 He, Baogang. 2004. "Confucianism versus Liberalism over Minority Rights: A Critical Responses to Will Kymlicka."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1(1):103-123.
- He, Baogang. 2004.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in East Asia."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2): 227-246.
- He, Baogang. 2003. "Why Is Establishing Democracy So Difficult in China: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Chinese Contemporary Thought* 35(1): 71-92.
- He, Baogang. 2002. "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Pacific* 2(1): 47-68.
- He, Baogang. 2000. "New Mor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China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ing the Prospect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ed. Suisheng Zhao. London: Routledge, 89-107.

He, Baogang & Yingjie Guo. 2000.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ers.

He, Baogang. 1997.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He, Baogang. 1996. *The Democratisation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He, Baogang. 1994. "Dual Roles of Semi-Civil Society in Chinese Democr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1): 154-171.

He, Baogang. 1995. "Desig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2(2) 292-321.

He, Baogang. 1993. "Infusing Morality into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 35-52.

Kendall, Timothy. 2005. *Ways of Seeing China: from Yellow Peril to Shangrila*. Fremantle, W.A. : Curtin University Books.

Lee, Mabel & A.D. Syrokomla-Stefanowska(eds.). 1993.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Past*. Broadway, Australia: Wild Peony ;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cCormick, Barrett & Jonathan Unger (eds). 1996. *China After Socialism: In the Footsteps of Eastern Europe or East 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Rawdon, Dalrymple. 2003. *Continental Drift: 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gional Ident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

Strahan, Lachlan. 1996. *Australia's China :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ger, Jonathan (ed.). 2008.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 Armonk: M.E. Sharpe .

Unger, Jonathan & Anita Chan. 2008. "Associations in a Bi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Corporatism." In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 ed. Jonathan Unger. Armonk: M.E. Sharpe. 48-68.

Unger, Jonathan. 2008. "The Strange Marriage between the State and Private Business in Beijing." In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 ed. Jonathan Unger. Armonk: M.E. Sharpe. 117-48.

Unger, Jonathan. 2008. "Rediscovering Chinese Society in the Socialist Era: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3): 223-43.

Unger, Jonathan. 2006. "China's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4): 27-31.

Unger, Jonathan. 2003. "Entrenching Poverty : The Drawback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Programs." *Development Bulletin* (61): 29-33.

Unger, Jonathan. 2002.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Armonk: M.E. Sharpe.

Unger, Jonathan (ed.). 2002.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Armonk: M.E. Sharpe.

Unger, Jonathan (ed.). 1996.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 Unger, Jonathan. 1996. "Bridges: Private Busin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47): 796-819.
- Unger, Jonathan & Anita Chan. 1995.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 29-53.
- Unger, Jonathan (ed.). 1993.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 Unger, Jonathan (ed.). 1991.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E. Sharpe and Sydney: Allen & Unwin.
- Unger, Jonathan. 1987. "The Struggle to Dictate China's Administration: The Conflict of Branches vs Areas vs Refor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8): 15-45.
- Unger, Jonathan. 1985. "The Decollectiv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 Survey of Twenty-eight Villages." *Pacific Affairs* 58(4): 585-606.
- Unger, Jonathan. 1982. "Grey and Black: The Hidden Economy of Rural China." *Pacific Affairs* 55(3): 452-71.
- Unger, Jonathan. 1979. "China'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Contemporary China* 3(2): 79-92.
- Zheng, Yongnian & Joseph Fewsmith(eds.). 2008. *China's opening society : the non-state sector and governa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網路資料

安戈教授個人網頁。

http://rspas.anu.edu.au/people/personal/ungej_ccc.php

宋國誠，〈閱讀左派，四海之內皆過客—霍米·巴巴的「本土世界主義」(下)〉，破報網站。

<http://pots.tw/node/2316> (02/03/09')

何包鋼教授個人網站。

<http://www.chinesedemocratization.com/>

何包鋼，〈正義：烏有之情與現實之域〉，《中國社會科學院報》網站。

<http://ssic.cass.cn/yb/38/5-2.html> (06/02/09')

何包鋼、王春光，〈中國鄉村協商民主：對一個個案的研究〉，社會學人類學中國網。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7/07/1388.html> (03/05/09')

朱政惠，〈國外中國研究熱潮和原因〉，《社會科學報》網頁。

<http://www.qinghistory.cn/tws/WSZL/XLXH/SSWH/hyhx/11/20/2006/18831.html> (06/05/09')

胡舒立、王爍、王歡，〈沒有開放政策，就沒有奧運會〉，騰訊網。

<http://2008.qq.com/a/20080824/003045.htm> (08/07/09')

崔中則，〈國外中國研究與世界的中國性〉，《中國圖書評論》網頁。

<http://www.cbr.org.cn/mag/articles/0709/1323.html> (06/07/09')

泰維斯 (Frederick C. Teiwes)，〈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網頁。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144 (05/07/09')

費約翰，澳洲中國研究協會會刊 *CSAA NEWSLETTER*第 28 期編者序言，澳洲中國研究協會網站。

http://www.csa.org.au/index.php?option=com_docman&Itemid=7 (06/12/09')

作者佚名，〈澳大利亞跟誰更親〉，中國新聞網。

<http://www.cns.hk:89/2000-09-06/26/44967.html> (7/24/08')

溫洋，〈美國六十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網站。

http://ias.cass.cn/show/show_mgyj.asp?id=862&table=mgyj (04/07/09')

Armitage, Catherine 著，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譯，2007，“澳洲中國研究專家國際揚名 - International applause for true-blue China hands”，*The Australian*，2007年 7 月 4 日。

http://www.cultural.teco.org.au/2005/latest_ch/education_01_2007-07-19.pdf
(03/06/09')

Barmé, R. Geremie. “Worrying China & New Sinology.”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4_worryingChina.inc&issue=014 (06/26/09')

Barmé, R. Geremie. “On New Sinology.”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http://rspas.anu.edu.au/pah/chinaheritageproject/newsinology/index.php>
(06/26/09')

Barmé, R. Geremie. “Shared Values: a Sino-Australian Conundrum”. David Hawkes, 'Chinese: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2_chineseCMH.inc&issue=012 (04/24/09')

China Journal 網站

http://rspas.anu.edu.au/people/personal/ungej_ccc.php

Chan, Anita & Jonathan Unger. "Blood, Tears, Toys, and NGOs." *Yale Global*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0094>. (09/0709')

Fitzgerald, John. "The New Sinology and the End of History". *CSAA NEWSLETTER*
(32)

http://www.csaa.org.au/index.php?option=com_docman&Itemid=7 (06/12/09')

Minford, John. "Lionel Giles: Sinology, Old and New."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3_giles.inc&issue=013 (05/24/09')

